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6.3

一年出版4期，以16種語言刊出

印度自我交戰的民主

Nandini Sundar

土耳其威權主義

Cihan Tugal

巴西盧拉主義的終結

Ruy Braga

新自由主義阿根廷 的勞動政治

Rodolfo Elbert

美國右翼的故事

Arlie Hochschild

大學和社會學

- > 英國企業大學的興起
- > 加拿大的社會學戰爭

紀念

- > John Urry, 1946-2016

特輯

- > 反對性暴力的學生運動
- > Mondragon的第三條路
- > 羅馬尼亞的編輯團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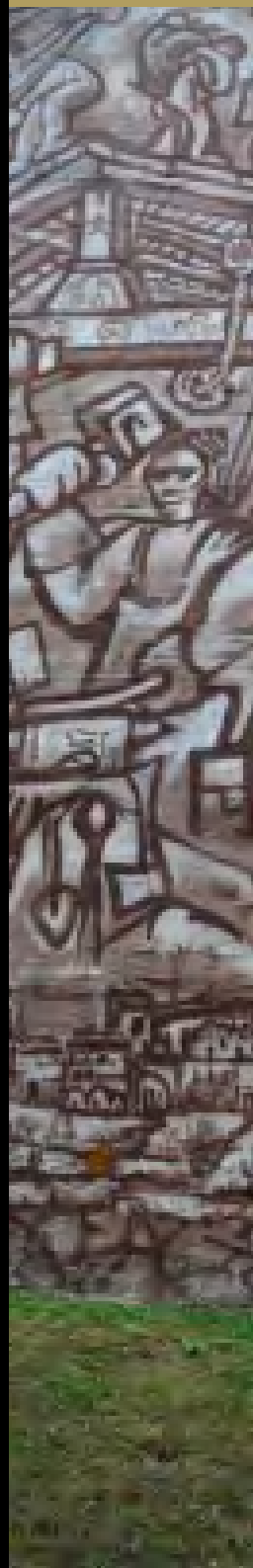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6卷 / 第3期 / 2016.9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編的話

21世紀的民粹主義

在2011年和2014年之間，《全球對話》對於震驚世界的社會運動相當樂觀——阿拉伯之春，佔領運動，Indignados，勞工運動，學生運動，環境運動，反對農村迫遷運動等等。我們的樂觀主義沒有持續太久，因為這些運動也帶來了一連串的反動民粹運動以及威權的興起。這期我們探討的右翼的興起，Arlie Hochschild 分析美國的 Trumpism 和茶黨；Cihan Tuğal 檢視了土耳其政權的威權轉向；Ruy Braga 解釋了巴西的右翼政變；Rodolfo Elbert 分析了阿根廷的新自由主義轉向；Nandini Sundar 描述了在印度反 Naxalite 運動的持續暴力現象。就像我們曾經討論的不穩定情境，我們可以從 Karl Polanyi 的市場過度延伸觀點來看這些運動的發生和變化。特別是今天的金融資本的規則已經導向了不穩定的全球化，讓右翼和左翼的民粹運動相互擺盪，兩者的共通點是反對代議民主。

我們也可以看到大學系統的金融化。因此，在這期之中，Huw Beynon 分析了失敗的管理主義如何接管了英國的大學，而其試圖還居然要去獲利。他描述評量研究「傑出」的系統如何生產了糟糕的研究，而還有對於費用的依賴如何讓學生成為消費者，而大學成為廣告商，為的無非就是去最大化學生的「滿意程度」。有一個大問題是，英國的企業大學模式是否可以成為世界其他地方的效法，或是其他的模式像是 Neil McLaughlin 和 Antony Pudgephatt 所說的加拿大處境會成功，不過即使在加拿大，學界還是要對抗保守的政府的越界。

我們也刊登了 4 篇紀念 John Urry 的文章，他不幸地在今年 3 月過世了。John Urry 是世界上最具原創性和最多產的社會學家，在許多領域都是先驅，從資本主義的轉型到觀光的重要性，把社會研究帶入了地利多重流動性。從全球暖化到最近他的新著《Offshoring》，此書處理了經濟擴張如何惡化了全球不平等和人權價值的違反。人們會記住他是未來的社會學家，因為他勇闖這個地球最災難的領域。

此外還有其他 3 篇文章，分別討論美國對抗性騷擾的學生運動，對於 Mondragon 合作社的辯護，以及《全球對話》的羅馬尼亞團隊如何克服翻譯的挑戰。我們希望其他團隊也可以寫寫關於他們翻譯的經驗。

全球對話以 16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Nandini Sundar, 印度社會學家，研究政治暴力，是《The Burning Forest》一書作者，剖析印度的 Chhattisgarh 省的戰爭。



Cihan Tuğal, 土耳其學者，《Passive Revolution: Absorbing the Islamic Challenge to Capitalism》一書作者，認為土耳其是 21 世紀威權主義的代表。



Ruy Braga, 是巴西著名的評論下層階級和工黨 (PT) 的學者，分析巴西政治最新的危機。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出版社提供贊助。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Gay Seidman.

副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y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n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Mitra Daneshvar,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Yutaro Shimokawa, Shinsa Kameo, Yuki Nakano.

哈薩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Gani Madi, Almash Tlespayeva, Almas Rakhimbayev, Amangeldi Kurmetuly.

波蘭:
Jakub Barszczewski, Adrianna Drozdowska, Krzysztof Gubański,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Lipiń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a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 Teresa Teleżyńska, Anna Wandzel, Justyna Zielińska, Jacek Zych.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ș, Corina Brăgaru, Costinel Anuța, Tatiana Cojocari, Andrei Dobre, Alexandra Isbășoiu, Rodica Liseanu, Mihai-Bogdan Marian, Anda-Olivia Marin, Ramona Marinache, Anca Mihai, Oana-Elena Negrea, Ion Daniel Popa, Diana Tihan, Elena Tudor,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ș, Carmen Voinea, Irina Zamfi rescu.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Lyubov Chernyshova, Anastasija Golovneva.

臺灣:
何經戀

土耳其:
Gül Çorbacioğlu, İrmak Evren.

媒體顧問: Gustavo Taniguti.

編輯顧問: Ana Villarreal.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21世紀的民粹主義 2

> 右翼的宰制
民主的自我交戰
by Nandini Sundar, 印度 4

土耳其威權主義：普遍的現象而非文化個性？
by Cihan Tuğal, 美國 7

巴西盧拉主義的結束和宮廷政變
by Ruy Braga, 巴西 10

阿根廷勞工運動和新自由主義的返回
by Rodolfo Elbert, 阿根廷 13

美國右翼的故事
by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美國 15

> 大學和社會學
英國的企業大學的興起
by Huw Beynon, 英國 18

加拿大的「社會學戰爭」
by Neil McLaughlin and Antony Puddephatt, 加拿大 22

> 紀念
紀念John Urry和期作品
by Andrew Sayer, 英國 25

John Urry：社會學和未來
by Scott Lash, 英國 27

John Urry：社會學家的社會學家
by Bob Jessop, 英國 29

相近與流動：紀念John Urry
by Mimi Sheller, 美國 31

> 特輯
學生反性侵害的運動
by Ana Vidu and Tinka Schubert, 西班牙 33

Mondragon 的第三條路：回應Sharryn Kasmir
by Ignacio Santa Cruz Ayo and Eva Alonso, 西班牙 35

《全球對話》的羅馬尼亞翻譯
by Costinel Anuța, Corina Brăgaru, Anca Mihai, Oana Negrea, Ion Daniel Popa, 和Diana Tihan 37

> 自我交戰的民主

by Nandini Sundar, 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 印度



Salwa Judum – 政府支持的私刑隊。不知名的人所攝影。

Nandini Sundar是研究政治暴力的知名社會學家。她花了25年的時間研究Bastar。那是一個衝突不斷的城市，位於中印度Chhattisgarh。她在唸博士的時候就住在那，博士論文後來出版了，叫做《Subalterns and Sovereigns: An Anthropological History of Bastar 1854-1996》(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之後的一本書醞釀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是《The Burning Forest: India's War in Bastar》(Juggernaut Press, 2016)，描述了Bastar如何變成了戰整，如何被外部政治力量所形塑，她自己在面對最高法院的經驗，以及幾乎長達十年的發綠過程，這段過程是試圖要去在憲法上對抗那對於人權受到侵害的犧牲者的私刑對待。雖然她和同事在2011年收到了讓好的判決，但是國家還是忽略這項判決，繼續其反社會抗爭的政策。《The Burning Forest》一書試圖去捕捉制度的失敗、國家赦免、公眾抵抗的交錯力量如何形塑了印度民主。

印度的民主總是吸引的很強的意見。印度的政治人物、主流媒體、精英等認為在後殖民社會之之中，印度是值得驕傲的，因為它友普遍選舉權，聯邦制度，軍隊國家化，以及獨立司法體系。可是運動者則不這麼認為，他們說印度的民主很可恥，因為保留了殖民時代的「緊急狀態」法律，像是東北武裝部隊 (AFSPA)，這讓軍隊可以射殺可疑平民，也造成時有聞知的非發處決，刑求，強暴，失蹤等等。而且還有和政黨相關的組織屠殺，像是對弱勢族群 Sikhs 人 (Delhi, 1984) 和穆斯林 (Gujarat, 2002) 等的攻擊。

學術界對於印度民主的討論集中在政治學，並且處理政黨、選舉、制度架構、發展政府。反之，我採取了社會學的取徑，試圖去保持中立，這就是在《The Burning Forest》一書之中的方式，然後去檢視政府的反射連暴亂政策，鎮壓「極左派」，然後探討這些對印度民主的影響。

印度現在對於毛派印度共產黨游擊隊 (Naxalites) 的打擊已經十年了。但是雖然第一階段的 Naxalites 運動在 60 年代末期發生並且在 70 年代暴力地粉碎，我們總是沒有看到有詳細地對於當代發展的寄載。這是因為這項研究本身是很困難的，因為研究對象有爭議，但是也因為該運動集中在原住民或是特定的卡司特階級上面，特別是在鄉下或是叢林地帶。這和該運動早起的發展是相反的，因為那時候有中產階級、城市、學生的參與。現在許多的描述都是來自於和那些毛派人士一起旅行的記者所寫的，或是由智庫所報導。

雖然毛主義共黨運動擴散到了很多地方，但是戰爭的核心是密集森林、礦產豐富的地帶，也就是 Bastar，那裡住了很多原住民，是一個有 39,114 平方公里大的區域，位於中印度的 Chhattisgarh 省。毛派當初到了這裡侍從鄰近的 Andhra Pradesh 省來，是為了躲避鎮壓而來的，但是在地居民開始有了自己的需求。從 1980 年代開始，毛派軍隊建立了一個平行的省政府，分配土地，設立了集體工作隊，處理紛爭，徵稅，然後開始建立關係。當村人開始參與毛派政府運作之後，他們結合到了自己的文化傳統裡面。

在 2005 年的 6 月，印度的國家和地方政府發起了一個私刑組織叫做 Salwa Judum (淨化狩獵)，位於西南的 Bastar。其稱自己叫做反對「Naxalite 暴力」的「人民運動」。這個政策由地方的階級結構所支撐起來，也就是外來者對於當地居民的種族歧視支持了國家的現代化政策，奠基在把原住民拉去採礦的政策實施上面。Salwa Judum 的領導者都非原住民，然後都是 Bharatiya Janata 黨 (BJP) 或是議會黨的樁腳，這些都把毛主義者視為威脅，因為毛主義反對

礦業的投資。

在 2005 和 2007 年間，Salwa Judum 的部隊和維安部隊開始燒房子，搶糧食、牲畜、金錢，然後強暴和殺戮村民。毛派開始報復，大約有 50,000 村人被迫加入「慰安營」，也有相同數量的人逃走。雖然 2007 年之後，開始有人回去，但是對於那些當初有幸逃跑的人來說，也有長期的創傷。

根據官方資料，在 2005 和 2016 年之間，總共有包括平民、毛主義者、維安警力共 2468 人被殺。而真正的人數通常是更高的，多數發生在 2005 到 2007 年，以及 2009 到 2011 年。在 Operation Green Hunt 的時候，當政府派遣了「中央武裝警察部隊」(CAPF)(只比軍隊低了一個層級)，還有無人機，直昇機，坦克。

而在標準的反社會運動的政策執行下，政府招募了投降的毛主義者去找出他們以前的隊友，當地的年輕人認為他們僅僅只是加入警察。這些特殊警察 (SPO) 無法回到自己的村莊，住在警察部隊裡面，但也被正規警察所看不起。當一些維安人員對於殺戮爭取功勳的遊戲樂此不疲的時候，也有人對於這樣的情況感到非常無助。政治人物和資深的維安官員對於這些現象則永遠無動於衷。

今天，Bastar 是印度最武裝的區域了，有著維安部隊，鐵絲網等。即使這樣，但是基本的衛生、教育的缺乏還是讓讓毛主義受到當地居民的支持。政府對於維安的花費比對當地的基礎福利可是要超出很多。

在這個相似性的前提之下，我想是值得去問：若是當初反運動政策是在民主制度下執行，而非在殖民體制下，那會有不一樣嗎？制度和行動者，包括政黨和人權組織、媒體、司法，會如何回應？

議會政治已經和戰爭無關，因為印度的主流政黨：議會黨和 BJP，都合作推動它了。當在的議會共產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儘管有著強大的鎮壓，其也沒有在國家的層級上有太大影響力。其它像是國家人權委員會已經不再中立，而且開始積極妥協，而且選舉和補償制度讓國家開始正當化之後，不論有無效率或有無民主，那都無關緊要了。

雖然印度的媒體相當自由且有活力，但是基於經濟利益，它們還是不會太得罪政府。那些反暴動的地方都是遠離都市的區域，那些幾乎都違反了人權，可是都沒有什麼人關心。對於 Bastar 的報導從完全忽視到相對多數的報導，但是這沒有讓政府更負責。在英語和印度語媒體之間的結構性差異，特別是後者都有著經濟和政治上的限制，這些都有影響。

人權組織已經在揭露濫用這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並且和毛主義者協商人質，並且把辯論聚焦在國家和游擊隊的暴力上面。同時，

都市社運者對於網際網路日益依賴也讓重要議題模糊了。在 Chhattisgarh，政府對於私刑的支持也伴隨著反恐法律的制定。他們逮捕知名的醫生和人權社運者，讓中產階級擔憂起來，即使釋放這些人，對於那些暴露在這些危險之下的一般人們也毫無幫助。

當地方法院失敗了，然後導致一般村民的高入囚禁率和 Chhattisgarh 叢生的監獄數量，印度的最高法院還是在 Bastar 這個大量的侵害案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是，無窮的延遲和國家對於法律判決的忽略，這些都意味著法律還沒有辦法實現正義。儘管法院對於 Chhattisgarh 政府的明確禁止私刑組織，像是 Salwa Judum，以及要他們停止招募在地人去加入其反叛亂的行動，補償被害人，和懲罰那些違反者，但是政府還是繼續違法，當法院不存在一樣，

自從 Modi 政府 2014 年上台以來，一些 Salwa Judum 元素已經被復甦了。對於 BJP 來說，國家支持的私刑是成為一種常態的政治。可是，公民還是繼續相信並且為民主奮鬥，即使實際的民主離理想還是很遙遠。■

來信寄給 Nandini Sundar <nandinisundar@yahoo.com>



村民遊行抗議Salwa Judum。不知名的人所攝影。

> 土耳其威權主義

普遍的現象而非文化個殊性？

by Cihan Tug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國



土耳其政府和庫德族工黨(PKK)之間於2013年得來不易的停火協議。在2015年暑期被Ankara所毀約。

土耳其的威權主義讓許多觀察家都驚訝不已，才在不久之前，這個國家被視為是中東地區的自由主義的燈塔。但是現在的學者則試圖去理解土耳其總統 Erdoğan 的個性轉變，以及土耳其文化的特殊性。

但是有一份對於自由派的分系給了我們一些線索（並且也給民主的西方了一些啟示）。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曾經被視為是人類最偉大的成就。可是，若是「自由主義」意味著崇尚著個人財產和自由，則因為和當今的新自由主義潮流（財產私有化、福利國家重組、財務金融化等）是攜手並進的，那麼其實土耳其的例子告訴了我們民主和自由化只可以共存一段時間，並且有關於國家的壓制實力、公民社會和政治的能力。

土耳其最近的經驗或許可以給其他國家一些警惕。知識分子曾經相信發展的後段國家可以把資本主義國家當榜樣，然而在1930年代的蕭條之後，許多人認為可能剛好是相反的：許多歐洲人也經歷了那些被殖民者的痛苦生活。大眾賦權和個人財產權和自由削弱了彼此的歷史上的重要性（戰時），然而這兩者可以再度攜手嗎？

> 錯誤的自由天堂

土耳其曾經是中東最民主的世俗國家。其特殊之處是奠基在保守黨的凱莫爾主義上面的。從1950年代開始，許多中間右派的政黨逐漸地解放了民族主義者、統合主義者、世俗政權，該政權是 Mustafa Kemal 在20世紀初期創建的。在2000年代，新的政黨：

>>

正義與發展黨進一步大眾化了中間偏右的政綱，結合了該國的保守和伊斯蘭傳統，這讓知識分子和大眾相當激情，支持 1970 年代就被引進但是不被注意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但是，這個成功故事的背後有著黑暗的一片。主流的論述把土耳其的自由化當作模範，這忽略了挑戰政府論述的團體：Alevi 的被打壓。這包括了罷工工人、環境主義者、左派，以及有時候庫德族的加入。西方世界的土耳其自由派選擇默視正義發展黨的宗派和文化政綱。其認為鎮壓是達到目的微小代價而已，因為更重要的是高經濟成長和凱莫爾軍事政權的退位。環境破壞、工人死亡、廉價工資、去政治化、去工會化、遜尼派的增加、家長制的暴力、都市的被迫遷徙等等，都是被所謂的那些新自由主義成就所造成的。

在正義發展黨的頭兩期任其中，政治和經濟的自由化造成了許多痛苦，並且也開啟了競爭的大門。在 2013 年夏天，環境和政治運動突破了其地方的界線。當自主的女性運動、Alevi 和世俗主義者加入之後，多數的都市起義也爆發了，像是 Gezi 運動，這造就了土耳其的歷史高峰。可是，雖然有上百萬的公民參與了，他們卻沒有辦法開啟一個共同的政治平台。工人和庫德族領導也只有有限地支持 Gezi 抗爭，左派也沒有全心投入，所有這三種勢力都因此為他們的不情願、困惑、無能而付出了代價。

在 2013 年，受到了政府增加的伊斯蘭和威權主義，許多自由派和那些反叛派站在一起，但是沒有取得任何成功。反叛證明了他們沒有辦法擴張其政治綱領到抗爭之外，Gezi 公園也沒有辦法保住。

► 自由主義變質成威權主義

儘管反叛一方很脆弱，政府還是用陰謀論暴力地鎮壓了反叛運動。事後，執政黨不僅變得更威權，還甚至獨裁，動員去打壓異己。

為什麼這個轉變發生了？自由主義加強社會緊張的關係，而非緩和。這和統合主義的目標不通。結構上強大的政體是可以在自由主義之下吸收社會的緊張關係的。弱的國家則無法在自由主義內達成。特別是當政體在面對強大的反對時，是可能無法控制反對運動的。在這個脈絡下，精英只好依靠反動員，然後為獨裁埋下基礎。這個路徑不僅僅

是被精英所控制，但也被政治和公民團體的存在所影響。

這樣的網絡對於土耳其的正義發展黨來說是可得的，因為其基礎是在 60 到 90 年代的伊斯蘭動員。在 2013 年之後，為了回應高漲的威脅，土耳其政府從我稱為的「軟獨裁主義」轉變成「硬獨裁」主義，反對 Alevi、罷工工人、環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然後最後反對自由派。

諷刺的是，最強烈的後 2013 年整肅對準了自由派的伊斯蘭團體：Gülen。這一個溫和的威權主義政黨，悄悄地穿透了各個組織，架空了政府的 Alevi 和左派。該團體試圖低調的進行整肅，和今天所看到的公開和儀式化的整肅大相逕庭。而在 Gülen 團體和老伊斯蘭團體之間也有鬥爭，是在都爭怎麼分享權利，但這個鬥爭在 Erdoğan 和以色列產生緊張關係之前並沒有檯面化。Gülen 是和美國的遊說團體還有其他西方國家有緊密連結的組織，那時就對於 Erdoğan 的反以色列立場有所質疑。而最關鍵的事件在於 Erdoğan 所支持的土耳其慈善組織破壞了 Gaza 的封鎖線。Gülen 接受了華盛頓郵報的訪問，說該行動是非伊斯蘭的，並且藐視政府。之後，正義發展黨的兩個勢力分道揚鑣，這對於政府來說是很大的代價，因為缺乏了高素質的政黨幹部。這讓政府轉向了大眾的動員和民粹。

在這樣的威權主義逼近之下，一個比較地方但是卻較為偶然和動態的現象產生了。阿拉伯地區的革命為土耳其的伊斯蘭派帶來了希望。除了自由派右翼和自由派左翼，其實伊斯蘭派總是希望恢復鄂圖曼帝國。正義和發展黨的領導人減低了其軍事特質，結合政治實用主義和新經濟與政治前景，但是在 2011 和 2013 年之間，該黨的帝國野心擴張了，然後就失控了。

正義發展黨的自由派和西方支持者希望政黨的長期帝國傾向可以被制度化為「軟實力」，這是被前學者也是外交部長的當時的總理 Ahmed Davutoğlu 所承諾的。他有兩個原則：「和鄰國不起問題」和「策略深度」。阿拉伯之春剛剛開始的時候，似乎 Davutoğlu 的努力被深化了，但是他在 2016 年被清算了，為什麼？Erdoğan 的個性。不太是。若是政府可以利用阿拉伯之春，那政府也不用放棄軟實力路線了。就像許多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政商的連帶在土耳其也試著要擴展外國市場，但是勞動運動、政治分化、



2016年7月16日的失敗政變。這讓威權主義深化了。

內戰和軍事介入，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阿拉伯資本家鎖定的市場已經不再有吸引立了，這些地緣政治經濟瓶頸和世界市場限縮了商業的擴張。政府現在現金少了，不能重分配了，開啟了土耳其的伊斯蘭商業階級的福利制度的新問題，經濟衰退了，那政府只好強調伊斯蘭的價值了。

在敘利亞，土耳其的一開使的經濟理性努力想要把 Assad 移走，讓一個比較親商的伊斯蘭政府上台，可是這項努力被遜尼的建國派所中斷了。這個失算導致了 ISIS 的產生，一開始被視為是對於庫德族的一種反向平衡，是好事，但是後來卻很不穩定，讓西部和南部土耳其的旅遊觀光和生意大受影響。此外，一般認為反 Assad 的聖戰士和這個中東的唯一民主國家之間有合作的跡象，這讓西方更加認為伊斯蘭和民主難以並存。

這個轉變的事後發展有著全球的意義。土耳其的機會主義毀滅了敘利亞，造成了歷史上最大的移民潮到歐洲，因此也有最大的右翼動員。歐洲右翼擔心軍事伊斯蘭主義，給了土耳其一個很明確的訊息，那就是整個歐盟不再可能了。2006 後這雖然已經很明朗了，但是在 2010 年之前並沒有讓土耳其的政綱有太大的轉變，歐洲的絕望也和其他削弱自由主義的勢力相互增強。當阿拉伯人口嚮往自由（土耳其精英希望可以為了其商業和帝國野心而操弄）的同時，土耳其伊斯蘭派失去了討好的歐洲的興趣。

✧ 土耳其的路徑如何可能其他地方重蹈覆轍？

即使上述的動態許多是土耳其的特殊之處，整體削弱自由主義的結構在全球是有可能出現許多類似土耳其的案例的，特別是這是地方和民族國家的互動，也是地方和全球過程的互動。更重要的是，全球上伊斯蘭內

部的右派轉向已經讓西方震驚不已了，激起了不僅僅市政府的世俗化還包括了右翼的動員。這些惡性循環是有全球的結構基礎的。

現代歷史的兩大自由化循環都以全球的姿態展開。在兩個時期，解組是全球也是地方的現象。20 年代之後，古典自由主義變成了美國和西歐的鑲嵌自由主義，然後東方則是威權和獨裁政府的興起。由於釋放的社會力和世俗化，鑲嵌自由主義變得越來越不可能。

除非知識分子、政治人物、運動者成功地找處了另外的全球替代道路，大規模動員會產生持續更長的威權主義國家，甚至會在西方發生。土耳其的經驗視對所有人來說的警鐘，失敗的革命會導致更災難的後果。現在的脈絡下，若是強固的政治綱領在 Gezi、Occupy、Indignados 等運動後沒有被具體執行，那代價可是非常高的。■

來信寄給 Cihan Tuğal <ctugal@berkeley.edu>

> 巴西盧拉主義的結束 和宮廷政變

by Ruy Braga,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巴西, ISA勞動運動研究委員會(RC44)



巴西的議會政變：下議院投票彈劾總統Rousseff。

總體來說，對於巴西限在的政治經濟危機之分析主要強調政府經濟政策的錯誤，以及工黨(PT) 總統 Dilma Rousseff 所繼承前任總統 Luíz Inácio Lula da Silva 路線的失敗。雖然政府政策是讓這次衝突提高的原因之一，但是這樣的觀點太過於狹隘了，沒有辦法解釋限在危機的複雜性。這些解釋試圖模糊了階級結構的變化，但是這是發生在 Lula 時代的事情，並且忽略了國際經濟危機的影響。的確，這樣的分析沒有辦法解釋政治管制和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沒辦法看到這不但無發緩和階級衝突，反而將之激進化。

> 罷工週期

在工作的世界裡面，任何在從屬和宰制階級之間的瓦解通常以罷工的形式展開。按照工會統計和社會經濟研究部門的 Strike Tracking System 的最新資料(SAG-DIEESE)，巴西的工人2013年開始了史無前例的罷工潮，總共2,050次罷工，這是134%幅度的增加。因此，這個國家前20年的少數罷工和工會運動可說是大轉向。在許多的主要城市裡面，在2013和2015年之間工會工人的罷工成為常態。教師，公務員，鋼鐵工人，建築工人，司機等也有參與

工運增加的傾向。相同的，私人部門的工會也從2012年急速的增加了。

在2013年，私人部門的罷工代表了54%的總量。這裡特別值得提出來的是服務業的工作爆增，包括了非技術和半技術的工人。許多工作都被外包且無償，這是因為不穩定的工作合約和勞工權利的缺乏。而除了8次的全國大罷工之外，銀行的雇員，觀光業勞工，清潔工，健康產業，安全，教育，通訊等領域的罷工特別活躍，交通部門也是。

總之，工會踴躍地擴張到各個部門的工人，並且被認為是工會軍事策略的核心。即使在公共部門，罷工也發生了，並且擴展到公部門的不穩定臨時契約工去。總體說來，不論在私或是公部門，罷工從「中心移到了邊陲」，包括了許多增加都市臨時不穩定契約工。

所以在這個罷工週期的前提之下，或許這裡可以看到最被低估的一種解釋：統治階級不需要工會官僚，因為它們無法控制底層的工人。這個觀點來說，只有可靠的統治階級計畫可以讓資本積累復甦，而且是透過深化社會錯置和削減工人權益。

而現在的罷工週期消長和巴西所面臨的底層階級的生活困苦可謂是顯示了盧拉

>>

主義的限制。為了了解這個計畫的矛盾所在，我們要去分析 PT 的不穩定霸權之限制在過去 13 年如何演變。

► 危險的霸權

盧拉主義 (Lulism) 被理解為是階級衝突的管理模式，因為其作為霸權的社會關係是奠基在兩個不同但是互補的同意形式上面的。而兩者一起生產了過去十年相對的社會平和。巴西的底層階級給予了政府被動的同意，政府的政策則是由工會官僚所背書的。這確保了一定程度且有效的讓步給工人，至少在經濟擴張的時期是如此。

而半鄉村的無產階級是受益於 Bolsa Família 計畫的 (家庭基金)，這處要是從極端貧窮到官方的貧窮線上。而都市工人階級也被最低工資的提高所吸引，以及也被勞動市場的形式化和就業增加所吸引。工會的工人得利於擴張的勞動力市場，也透過集體議價而得到較高的工資。

至少在 2014 年總統大選之前，PT 結合了重分配政策、正式工作的開創、以及大眾對於信用的取得，然後推動一個輕微的去集中化的全國經濟重分配。在不平等的巴西，這個一小步其實是足夠保住工人底層階級的同意的，並且也保住盧拉主義的政治管理。

同時，PT 政府也視圖去結合工會官僚的興趣，社會運動的領袖和知識分子化的中產階級，然後開創一個對於奠基於國家機器之盧拉主義的主動同意。上千上萬的工會成員被吸納議會運作、政府部門、公有企業之中。

一些運工會官僚佔據了福利基金等部門的策略的位置，那些基金是被國家的投資部門所管理的，像是國家發展銀行 (BNDES)，巴西銀行，以及 Caixa Econômica Federal。

因此盧拉主義的工會變成了不只是一個主動的布爾喬亞國家的管理階層，也是個主要的行動者去引導資本的投資。因為這個政治管理權力沒有包括私人資本，工會官僚所佔據的優勢社會位置主要依賴於國家機器，而為了去再生產這個控制，兩者的利益，盟友—中層的官僚和小知識布爾喬亞，和敵人—具有敵意的官僚和企業利益，兩者必須要在國家機器中取得平衡。

雖然這個策略被 PT 政府對於反民主原則的巴西選舉之接受而複雜化了，包括了在 Lula 第一任期的直接收買議會支持，而在 2014 年之前，Lulista 霸權已經到達了一個可觀的成功地步，亦即不論在再生產被動的大眾同意或是工會社運的積極同意上，都是成功的。

► 盧拉主義的矛盾

然而，社會的矛盾已經展開了，特別是在 2003 年和 2014 年之間的經濟擴張，預示現在的危機。儘管令人印象深刻的正式部門工資的上升，有 94% 的工作 (在 PT 的第一個十年中被創造出來的) 只被支付了 1.5 的最低基本月薪 (大約 250 美元) 或更少。2014 年之前，當經濟減緩時，有 97.5% 的新工作是屬於這種，而也多數是女性、年輕人、黑人。也就是說，那些都是之前本來就被歧視或是比要弱勢的工人。

同時，年復一年，工殤意外和死亡數量的增加以及換工作頻率的增加，這都表示了工作品質的降低。持續深化的經濟危機和撙節政策的方向，主要集中在 Dilma Rousseff 政府時期 (2014 開始)，這些退步都促使了工會工人的罷工決定。

雖然已經開始搖搖欲墜了，無產階級的支持還是讓 Dilma Rousseff 順利選上總統 (2014)。但是這樣的支持讓 PT 政府會維持正式的工作 (但是低品質和低薪)。不過政府支出削減所促使的循環集中也導向了失業率的增加，特別是在都市無產階級和工會工人階級。按照最新的研究指出，巴西的失業率在過去一年從 7.9% 增加到了 10.2%。

另外，傳統的中產階級變成了右翼，包括了那些原本和 PT 政府結盟的主要工會聯盟 CUT 和至少在 2005 年之前的賄選醜聞 (Mensalão) 之前是如此。我想這並不難去想像為什麼。在就業政治化的進步之下，其實薪水提高了，但是就業市場的刺激也提高了服務的代價。這馬上影響到的就是中產階級生活型態。而大眾消費的提供也連結到了更高的巴西窮人薪水上面，意味著工人「入侵」到了傳統中產階級的領域，像是購物中心和機場。

最後，低品質的私人大學主要是給工人階級的小孩的，這也增加了，且讓原本只有給中產階級小孩的就業市場變得更加競爭。當 Petrolão 醜聞，也就是國有石油企業 Petrobras 的洗錢案發生時，中產階級的不滿爆發了，一連串的抗議產生，主要就是不滿政府的政策。

因此 Rousseff 政府在國會中支持的瓦解只是在一連串危機中最顯而易見的而已，其根源在於整個蕭條經濟的社會結構之中。以不穩定工作和收入分配的去集中化為基礎，巴西的發展模式不再可以保證企業獲利，更不說吸引下層階級的共識了。

> 宮廷政變

面對了越來越糟的危機，主要由銀行帶領的巴西企業代表開始要求聯邦政府更進一步的撙節政策。對大企業而言，那些政策可以深化財務調節，增加失業，控制罷工週期，所以看起來是必要的步驟去啟動一系列的不受歡迎的改革，像是社會福利和勞工權益的縮減。

這個計畫開始被現任的 PT 政府的撤退所支持。而財務調節也被應用到 Dilma 的第二命令的開始，但是這背叛了 5 千 3 百萬的選民的期待，這些選民士被她的選舉所吸引了，包括了維持工作、社會福利、勞工權利的主張。第二任 Rousseff 政府的不受歡迎程度進一步被中產階級的不滿所煽動，他們不滿階級之間不平等的縮小。當聯邦政策部門的 Lava Jato 決定要去聚焦在 PT 那些牽連到 Petrobras 貪腐的政治人物的時候，巴西民眾開始上街抗議政府。

這個動員也讓在 2014 年敗選的政黨開始推動彈劾。而在巴西社會民主黨 (PSDB) 和巴西民主運動黨 (PMDB) 之間的談判也越來越激烈，但是在後者的政治宣言「通往未來的橋樑」上有所交集，基本上，承諾要去償付對銀行的公共債是用教育、減康、社會安全等的削減作



前總統Lula和被彈劾的總統Rousseff。工黨的領袖，領導巴西13年。

為代價的。

更重要的是，保守的政治勢力開始去推翻巴西政府，並不是因為 Rousseff 對民眾的所作所為，而是因為她無法成功帶給企業家訊息，那個訊息就是激進的財政調節，那需要修憲，改革社會安全和放棄主要的勞工保護。然而另外一方面而言，工會大多數被 PT 控制，而且然處於歷史性的大罷工週期之中。

因此巴西現在正處於一個死結當中：政變開始面臨了大眾的反抗，而這個反抗將會讓死結更緊。非法政府所採用更攻擊性的手段也被國會所採用，所以可以預期的是一個更前所未見的社會抗爭的出現。■

來信寄給 Ruy Braga

<ruy.braga@uol.com.br>

註 1：關於巴西的這三個下層階級，件 André Singer, Os sentidos do lulismo: reforma gradual e pacto conservador (São Paulo, Companhia das Letras, 2012); Ruy Braga, A política do precariado: dopopulismo à hegemonia lulista (São

Paulo: Boitempo, 2012); and Roberto Vêras de Oliveira, Maria Aparecida Bridi and Marcos Ferraz, O sindicalismo na EraLula: paradoxos, perspectivas e olhares (Belo Horizonte, Fino Traço, 2014).

> 阿根廷的勞工政治 和重返新自由主義

by Rodolfo Elbert, Conicet and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阿根廷, ISA勞工運動研究委員會(RC44)



Northern Gran Buenos Aires的勞工抗議解僱。Sebastián Lineros攝影。

在 2015年11月22日，阿根廷選出了 Mauricio Macri 作為 2015-19 的總統，而且只有贏得了小於 3% 的全國選票。Macri 之所以可以擊敗 Peronista 候選人 Daniel Scioli，代表了長期 Kirchnerista 的時代的結束 (2003-2-2015)。在增加的國家介入經濟和有限財富分配的時代之後，中間偏右的候選人佐以反貪腐的論述贏得了大選。

對這個成功的解釋迫使了一種反民粹的動員，這發生在經濟停滯的阿根廷都市中產階級中。但是任何對於失敗的幾也需要納入工人政治的討論。Kirchnerista 政府威機的根源是可以在這個矛盾的進步財富分配和工人階級分化的處境中找到。透過和 Kirchners 的結盟，阿根廷的長期工會官僚已經幫助建構了一個分化的工人公民身份，而左派的草根工會也動員去反對不平等。一旦經濟的停滯銷蝕政府有限的重分配政策，那的代表了 Ruy Braga 所說的「不穩定霸權」之社會的分化就造成了選舉的失敗。對於新自由主義入侵的反抗需要納入相同的草根工會在 Kirchnerista 時期去對抗經濟不安全，

在 2000 年代晚期，就像世界的其他地方開始出現了金融危機一樣，阿根廷也精力的不同的重生。這是一個新的「草根工會主義」(sindicalismo de base) 的出現。這個運動的出現似乎預告了勞工運動的重生，特別是在阿根廷 2001-02 的經濟危機重創全國經濟和光榮的工會的十年之後。例如，在 Northern Gran Buenos Aires 的貧窮地區 Los Tilos，居民組織的土地佔有運動，要求更好的基礎設施和房屋，然齣堅持公司必須停止污染河川。要知道的是，儘管這些人住在工業區附近，但是這些人大多是失業的。

令人驚訝的是，Los Tilos 的 2010 抗議受到了強大的支持，支持來自於代表正式工人的工會，大部分是在附近的工業受雇的工人。做為重新活化工運的一部分，在許多 Northern Gran Buenos Aires 地區的工廠企業的工人運動都是被草根民主工會所領導的。但是許多全國的工會仍然是由傳統官僚工會幹部領導，他們是 Kirchnerista 政府 (2003 年上台) 的同路人。總之，這些官僚工會追求的是排他的策略，鮮少支持與都市窮人的團結，並且總是允許資方去僱用臨時契約工

>>

人，然後確保核心的工人有教高的薪資。

但是在 2000 年晚期的草根工會運動出現之後，這個工會是不一樣的，它是一個左傾的工會，尋求正式與非正式工人之間的連結，剷除臨時契約工的模式，然後所有工人都有相同的權利。

而在這個驚人的新工作增加的背後發生了什麼事？矛盾的說來，阿根廷的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生產了一個不尋常、破碎的工人公民身份，並且透過官僚工會的支持而得以可能。在 2001-2002 年的經濟與社會危機之後，阿根廷的經濟開始成長，出口增加，刺激了就業機會，擴張的國內市場，然後支持了工會的集體議價權利。

失業減少和工資增加，加上增加的政府設施和社會福利的補助，這些主要是針對最貧窮的人口的，於是中產階級的消費增加了。按照職業結構的觀點來說，這樣的經濟成長增加了相對了薪資價值。

然而，這些重分配的政策有及侷限。隨著經濟擴張，資本越來越集中，當然大型的國家和跨國企業增加利潤的時候更是如此。工人則面對了工作的非形式化和不穩定的危險。按照拉丁美洲的社會經濟資料庫 (<http://sedlac.econo.unlp.edu.ar>) 來說，在 2010 年之前，有 45.5% 的阿根廷勞工是有非正式受雇的，這比經濟危機時期以前還好些，但是對於工作和收入的不安全的低收入戶來說，這是重要的資源。

在 2010 年，Cristina Kirchner 政府仍然試圖找出新自由主義瓦解的出路。其藉著結合有限的財富分配和持續的工人階級分化而進行之。但是在數年之間，阿根廷的經濟開始歷經了受到金融全球化的危機影響。全球商品的價格狂跌，而政府也努力要去保持其有限的重分配方案。2011 年的時候 Peronista 的政治精英取消了其和官僚工會派別的聯合，拒絕容忍 CGT（總工會）的政治野心擴張。而在危機時期出現的經濟和政治的聯合也開始式微。

在 2014 之前，阿根廷披索的貶值和通膨的壓力導致了貧窮的增加和實質工資的降低。而在政府的霸權減弱之後，Peronista 的候選人 Daniel Scioli 輸掉了 2015 年的總統競選寶座，輸給了右翼 Mauricio Macri。

在這個頭 6 個月之中，Macri 的取徑可以被稱為是阿根廷試圖想要回返新自由主義。而政府執行了幾個市場導向的政策，包括了大規模解僱政府雇員，然後削減政府補

助，例如水電補助。披索的貶值也意味著薪水無法跟上通貨膨脹，讓貧窮率大幅提昇（像是 2014 年）。隨著通過了新的反勞工法案，政府也對農業和礦業出口進行減稅。這造成了全國了抗議活動（4/29），反對解僱，但是之後也沒有其他的行動。

但是，儘管政府很清楚地反工人權益的政策方向，其實全國的工會領袖也似乎更擔心保留奇功會的制度權力，也更關心避免個人的貪腐，保護工人的勞動權益。

在 Kirchnerista 時代，這個仍然年輕的、面對非形式和不穩定情況的草根工會將會怎麼樣呢？有可能的大部分的工人階級會支持團結的策略、支持那些在非形式和危險狀況中的工人嗎？我想現在下判定還太早，但是可以看看最近的發展得到一些啟示。2000 年代晚期，在甚至是最不受歡迎的工作和官僚環境之中，一些阿根廷的草根工會也試圖要形成和不同工會派別之間成功的連結。雖然這些工會面對更大的挑戰，特別是當他門試圖要去把團結上升到國家的層次，但是似乎很清楚的是勞工運動去對抗新自由主義班師回朝的能力將會有賴於這種策略。另外的策略似乎就是靠勞工運動領袖去積極的去遵守新的市場改革政策，但是這樣只會讓阿根廷的工人處境更加艱難而已。■

來信寄給 Rodolfo Elbert <elbert.rodolfo@gmail.com>

> 美國右翼:深層的故事

by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國



Donald Trump的競選造勢活動。

就像在歐洲、印度、中國、俄國，美國的右派興起了很大的變動。在某些方面，美國的左派文化轉向，包括了第一個黑人總統、非常有可能的第一為女性總統、同性婚姻權等，這些或許遮蔽了這個右轉。但是實際上右轉就在那裡。在過去的幾十年，保守的聲音越來越宏亮，最受歡迎的電視頻道和脫口秀廣播都是非常右的。國會兩院也都被共和黨所把持，共和黨也掌握更多的州議員的席次和更多的州長。在50州裡面，有23州是參眾兩院都被共和黨所把持的。相反地，只有7州是民主黨掌控了參眾兩院。而有20%的美國人

(4千5百萬)支持反稅的茶黨，並且在最近也踴躍支持民粹本土主義的共和黨候選人Donald Trump。其共和黨初選的得票率創下了共和黨的歷史。

左派和右派的區隔點在於又對於聯邦政府的討厭。右派要削減政府福利，包括失業保險、健保Medicaid、大學學費補助、學校午餐等等。共和黨甚至要砍掉許多聯邦政府的部門，像是教育部、能源部、商業部、內政部。2015年有58個共和黨眾議員投票廢除國家稅務局。有些甚至要廢除所有的公立學校。

共和黨的草根支持者對

於政府失望又憤怒。而我知道為什麼。這個大哉問促使了我到路易斯安那州去做了5年的田野。該州是美國右派的核心地之一。當我為我的新書《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進行訪談時，只浮現了更多的謎題。路易斯安那是全美第二窮的州，比起任何其他州，該州有更多倒閉的學校，有更多生病且肥胖的人，所以我想知道的是，為什麼有那麼多茶黨支持者生氣？而他們的憤怒又怎麼進入了政治？

許多人從個人經驗的外部去處理這個問題，但是我

想從個人經驗的內部出發。所以我參加了該州西南部的共和黨女性集會，教會，選舉造勢場合。我問他們在哪裡長大，去哪裡上學，父母親被埋葬到了哪裡等等。我也找了我該州朋友的高中畢業紀念冊，和他們打牌，然後一起去釣魚。我總共訪問了60人，其中40人是白人、老人、基督教的茶黨支持者。我總共匯集了4,600頁的訪談和田野筆記。

我也不經義地採用了一個方法。首先，我聽他們說。然後我草擬一個他們經驗的譬喻詮釋，不帶入任何價值判斷，這種虛擬寫實的描述我稱為「深層故事」。我相信在我們政治信仰的背後都有著這麼樣的一個故事。在這個案例中，故事是像這樣子的：你耐心地站在長長隊伍的中間，隊伍一直延伸到山丘上，其他隊伍中的人都和你相像：白人、年老、信仰基督、且絕大多數是男性。而在山的另一頭就是美國夢，是每一個人的夢。然後，看！突然間有人就在你面前插隊了，當他們插隊之後，你就往後退到隊伍的後面了，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子做呢？他們是誰？

許多人是黑人，之所以可以插隊就是因為政府的平權法案，他們被給予進入大學的優先權，工作，福利，免費午餐。其他插隊的還包括女人，移民，難民，都要進入優渥待遇的政府部門工作，而薪水還是納稅人的錢去支付的，這樣下去還有完沒完？

當你等待的時候，你還被要求要為這些插隊的人道歉，為種族主義、歧視、性別歧視等到欠。你聽到收壓迫的黑人的故事，受宰制女人的故事，受到驚嚇擔憂的移民的故事，同性戀的故事，難民的故事。但是某個時間點上，你告訴你自以，

你必須要關閉同情心的邊界，特別是向那些可能會帶來傷害的人關閉邊界。

你其實是個有同情心的人。但是現在你卻被要求要把同情心也給那些插隊的人。你已經吃很大的虧了，但是你都還沒有抱怨或是求救，你也很驕傲你這麼做。你相信平等權利，但是，你的權利呢？有人在忽嗎？你的權利就不是權利嗎？這並不公平。

你看到黑人總統的名字有個 Hussein，然後他跟插隊的人招手。他不站在你這邊，而站在插隊的人的那邊。他是那些人的總統，不是你的總統。而且，這個總統不是本身就是插隊才當上總統的嗎？怎麼可能一個單親媽媽的兒子有可能讀得起哥倫比亞和哈佛大學？這或許有不可告人的祕密。還以，總統和他的自由派黨羽支持者不就是用你的錢去幫助那些插隊的人嗎？然後你想把整個政府關掉，因為政府允許插隊。

我把這樣的故事拿給我的受訪者看，看看他們這樣的深層故事是否符合他們的想法。雖然有些人改了一些地方（像是「所以我們到了另一隊伍」，「那是我們那些被他給出去的錢」等等），受訪者都認為那是他們的故事。一個人甚至這樣說：「我就住在那個故事裡面」；另外有人也說「你完全了解了我的心聲」。

為什麼這個故事那麼真實？簡言之，光榮不再。我所遇到的茶黨支持者其實並不窮，但是許多都是貧窮出身，也看到了許多親朋好友又再度貧窮。不過財富不是唯一的幸福和光榮的來源。身為白人，異性戀，基督教，許多人也擔憂這種人口結構的消失（「越來越少人像我一樣」，有人這麼告訴我），

或是害怕變成了宗教少數（「人們不再上教堂了」，「你不能說聖誕節快樂，要說假期快樂」），有些人甚至認為自己是文化少數（「我們是整潔的人，我們奉公守法，但是卻被稱大男人，恐同，種族主義者，無知，這些都是自由派給我們的標籤！」）。若是講到家鄉，通常是鄉村的中西部或是南方，有些人被看成是「大老粗」。總之，在這些深層故事的背後，是一種光榮的消逝。

深層故事描述了痛苦（插隊），也道出了責備（失敗的政府），最後指向了救贖（茶黨）。這也是一種情感的表述系統，對插隊或是等待的人的同情要有多少，對政府有多麼不信任，以及政府的福利有多大程度是可恥的。這個系統成為感覺的規則，告訴我們什麼是什麼我們認為「該與不該」去感覺的。許多服務業其實都要求其員工要去遵守這種情感規則（「對客人生氣是錯的，客人都是對的。」）員工學習到子麼管理自己的情緒，然後上司會看看你怎麼管理。同樣地，政治意識形態也包含了情感規則。領導者指引同情、質疑、責備、可恥，電台主持人天天講這些規則，然後地方的或是線上社群則監督著。

左派或右派遵守著很不一樣的情感規則。大體上，左派呼籲要同情弱勢，政府要幫助他們。右派則不。左派要人們相信政府，但是右派懷疑。左派為政府幫助賦予尊嚴和權利，但是右派覺得可恥。

在這場文化戰爭之中，我研究的茶黨人士都認為情感規則被左派把持了。「我們受夠了政治正確！」Trump 這麼大聲叫著，呼應著右派的感情。一位男性受訪者告訴我，「自由派想讓



Donald Trump在Phoenix談他最喜歡的議題：移民。

我們對移民和難民感到抱歉，但是我看到一群說可憐我可憐我可憐我。」另外一位說，「自由派從政府那邊得到好處，但是我很高興我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但是他們卻要我感激他們所得到的好處。」而許多人則是把接受福利當作可恥的，且輕視那些作弊者。「我知道有人在狩獵季節申請失業。」或是「很多住在可移動房子的人說自己癱瘓不能走動了，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頭還能抬起來，而且政府還鼓勵。」許多茶黨人士則抗拒說要同情插隊的人、感謝政府、或是理直氣壯地接受福利的想法。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受訪者都同意。的確，針對這點，我的受訪者有兩派見解。第一是傳統的茶黨支持者想要把插隊和政府對於插隊者的鼓勵都拿掉。但是 Trump 的支持者則是想要保留福利，但是福利只能給本土的人，多數當然是白人。

Trump 的宣稱一直模糊且游移，但是評論家發現他從來沒有說要刪減 Medicaid。他甚至計畫要取代 Obamacare，把健保延長給那些沒有保險的人，是一個更棒的系統。另外 Trump 也把羞恥帶到他人身上，譬如嘲笑 John McCain，殘障的記者，女性 Fox 新聞記者，

非法墨西哥人，墨西哥裔的法官，穆斯林，共和黨幕僚，但是他從來沒有嘲笑過接受 Medicaid 的人。

但為了正當化給白人的福利，Trump 必須把這個賦予男子氣概。這或許是他這麼受到歡迎的祕密武器。他為那些爭論、擁槍、強硬的男人喝采。許多接受福利的是女人，小孩，還有有色男人。但是這些白人卻是窮的，或是怕窮的人。Trump 說接受福利是一種男性的事情，可以的。你可以在你的卡車上放持槍證，可以爭論，可以很大男人，同時也可以接受政府福利。

重要的是，許多的 Trump 藍領白人支持者面對的早期黑人所面對的經濟困難：沒有工作、低薪、失落。這些人之中，有更多的單親爸爸，更多的離婚，更多的小孩，以及更艱難的生活。他們若現在沒有接受 Medicaid 補助，那以後也將會是。所以他們其實是需要右派長期以來反對的政府補助。不接受福利是一種地位的象徵，區別「真男人」和「真魯蛇」。我許多的受訪者中，一開始對於 Trump 的保留福利政策都沒有提及，但是一旦被問到給予「一般人」的福利時，他們會說：「Trump 並不反對那些啊，當你因為低薪而接受福利，你不會希

望被人瞧不起啊。」

Trump 技巧性地讓藍領白人從羞恥中解放出來，但是這不包括非本地或是非白人。的確，Trump 對於這種深層故事的回應已經開啟了一種反移民、支持福利的國家的右派民粹主義，這在英國、德國、法國、奧地利、東歐都可以看得到。我相信所有這些右派運動都有著不同的深層故事，召喚著不同的情感和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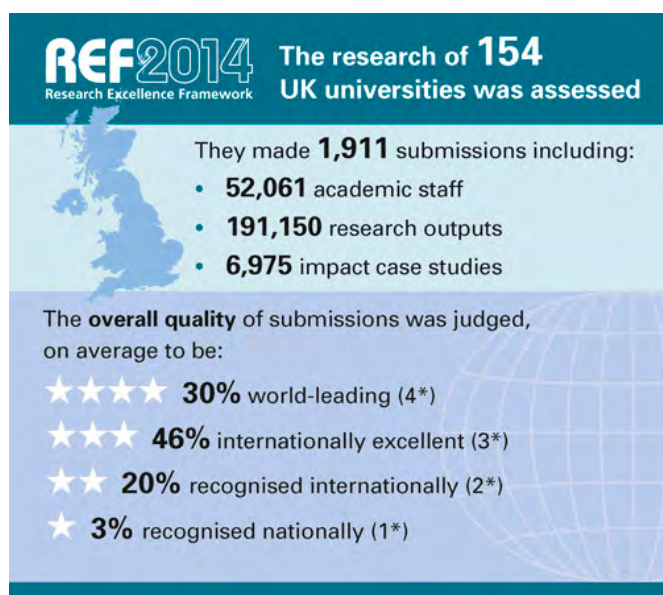
來信寄給 Arlie Hochschild
<ahochsch@berkeley.edu>

註 1：Hochschild, A. (2016)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New Press.

註 2：見：Hochschild, A.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英國企業大學的興起

by Huw Beynon, Cardiff University, 英國



2014年送給研究卓越架構的報告總結。

的體系，只有 10% 的人到高等教育，而多數的年輕人則是通過複雜的技職系統。

在 Thatcher 政府之下，英國製造業的衰敗也促使的「知識經濟」的辯論，導致了 Blair 對於「教育、教育、教育」的強調。他認為 50% 的英國小孩應該上大學，如此一來，大學開始變成政府經濟的重要一環，這樣的轉變讓高等教育的責任移到了貿易工業部上面。今天，這個責任在於商業創新技術部，其最近的政策白皮書是：「知識經濟的成功：卓越教學，社會流動，學生選擇」，這顯示了曾經的烏托邦理想怎麼提供了反動政策改變的意識形態基礎。

這個策略轉變是被英國大學的資金補助所幫助的，包括了從中央政府的資金轉移到了以學費為主的系統。1998 年，學雜費是每年 3000 英鎊，那時是新的工黨政府。現在提高到了 9000 英鎊，預期還會漲價。在北愛爾蘭、蘇格蘭、威爾斯等有不同，但是英格蘭的高等教育已經擴張成為了學生的負債來源，且複雜的貸款系統讓這更加沈重。

新的資金來源系統是變遷的主要原因。大學競相去招生，帶來了嚴重的教育後果：學生不再是學生，而是顧客。或許更矛盾的是，其引進的市場模式也帶來了許多國家監視的機制。

2005 年 Blair 政府把一個密集勞動的系統：品質評量（這是用來提昇教學品質

英國大學正在改變之中，透過一種很基礎的方式在改變，不容易預測會怎麼變化。但是確定的是，工作和研究環境是和十年之前大不相同的。Stefan Collini 最近說那「我們仍然稱為大學的東西將要被重塑成許多應用知識和職業訓練的場所，從屬於社會的經濟需求」。這也呼應了 John Holmwood 的 2014 年的英國社會學會會長致詞。他說英國的大學系統現在成為了更新的父權資本主義核心，並且深化了不平等。這些變遷對於社會學的影響不太清楚，但是有些擔憂是有跡可循的。

> 資金：從籌募到收費

歷史上，在 Thatcher 和 Blair 政府以前，英國大學是半獨立的慈善機構的。而學生數量也是全國性的一致，每個大學接受一定的補助。可是後來成為了「精英」

並透過使用標準化教室程序而達成的方式)換成了國家學生評量(NSS)。這是某個像是一個消費者市場調查的方式，收集學生對於課程和系所的評量。這些數據將會馬上變成判定什麼是最好大學的標準，然後會發表在各大報章雜誌上。

現在的政府規劃要去改進這種評量系統，想透過引進更複雜的教學卓越架構(TEF)，這考慮了學生的留級和就業表現，以及學生評鑑。雖然每個方式都被認為是有問題的，但是政府規劃要建構一個新的TEF系統，並在「我們期待會逐漸增加其差異性的收費」為基礎上執行。

► 從研究評量到研究卓越

在舊的資金系統裡面，大學雇員被期待要去教學和做研究，大概是3:2的比例。而公共資金的學術研究委員會則提供額外的研究資金，主要透過競爭而取得。Thatcher政府已經關注到校園的激進和批判聲音，堅持要把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SRC)改名成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ESRC)。長期以來這個組織已經逐漸被裁剪成英國經濟所適合的樣子了。更重要的是，一個一般每五年一次的研究評量就被引進大學系所。研究評量活動在80年代變成了非正式，但是從1990年代開始連結到未來的研究資金，和舊有的資金系統脫勾。

接下來的重複也看到了這個評量系統怎麼延伸出去。2015年，對於研究卓越架構(REF)改名也包括了進一步的行動：新的評量出版研究的方式對「社會和經濟有所助益」。專家也會「審查論述的證據，指標和評分後的影響。」這些檔案將會評分區分等級，從「世界領導級」(四星)，「世界頂尖級」(三星)，「國際認可級」(二星)，到「國家認可級」(一星)。

而外部的評鑑過程的研究策略討論也從邊陲移到了中央，像是用「明星」就在學術論述中出現了，隨著「卓越」、「紮實」、「嚴謹」、「透明」等用語，這建構了一個似乎無法反對的論述結構，也被接受了。這樣一來，「研究卓越架構」(Ref)、「可被研究卓越架構所認可的」

(Ref-able)、「可以被研究卓越架構所評量的」(Ref-ready)變成了強而有力的名詞。

► 企業大學

這些變遷也是部份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轉變了英國的工部門。這個在高等教育機構發生的變化和那些重塑這個國家健康服務產業、稅收、警察、教育的變化是平行的。大學競相收學生是現在收入的來源，而且為了得到一些標籤，大學像是企業，不在是慈善組織。

大學校長們不再是被看成是同等的，反而像是CEO，薪水是有高低分別的，而且有自己的年退休金計算方式。當現在保守政府把學生人數上限移除之後，可能會多收很多學生而現金存量在2011年是65億。這就是在鼓勵英國大學跟美國大學看齊，往債卷市場和房地產投資，許多管理的精英認為這些新建築是成功的代表。

在試圖提高招生(收錢)的時候，大學其實也因為國外學生的簽證限制而受限，於是便把分校往國外開設，提供一些大學職員很難拒絕的方案。有成功的案例，但是也有失敗的。在2015年，Aberystwyth大學花費了五十萬英鎊去Mauritius設立分校給英國和國際學生，希望可以提供「新的機會給學生去擁有高品質教育。」但是2016年之前，只有40名學生註冊到這所可以容納2000人的學校。一個前大學校長這麼評論：「這個投資很瘋狂，他們若是把更多資源投入到教師和職員上面，吸引更多國內的學生，那會更好。」

所有這些都關於這個場域壓力極大的轉變，而並且對於學術人員來說有著非常真實的意義。新的企業大學試圖去透過讓校長決定在新的管理和由上而下的模式中要達成那些目標，然後進一步中心化。新的管理階層於是出現，像是技術和財務的「支持人員」。這以往是院系或是中心自己自主的領域，但是限在有一個中央的組織來負責。溝通逐漸只透過email而非面對面接觸，簡單的操作像是保留一間會議室都要都過訓練使用電腦來達成。

當「程式」成為管理工具，那他們就強化了這種標準化的壓力，而這在許多大學裡面被連結到績效表現管理系統。成效相關的薪資也在其議程上面，而且更重要的是，這還把所有的學術人員移到了新的、唯有教學的契約上。

這種在政府治理結構裡面的「官僚」和「目標錯置」的病徵 -- 用以前 Alvin Gouldner 所說的詞 -- 就明顯的存在英國的大學裡面，特別是教學和研究評量架構之中。而大學也警告學生說他們學位的爛表現也會影響到以後他們的就業市場上的價值。而最高階級的獎勵是受到監督的，並受到鼓勵說「最上曾有更多的彈性」。學生已經時常在批評課程，提供很糟的「回饋」，因此一些大學特定舉辦說明會說什麼是給學生的回饋和什麼時候他們會得到。事實上，一些大學已經任用了「回饋主任」去處理這些事情，而一些職員也被認為是「回饋冠軍」。

這樣的「競賽遊戲」活動也延伸到研究評量上。2014 年許多大學從包含了所有的人到研究評量的這個傳統，轉變到只包含那些有很好出版表現和影響力的研究。這樣的結果讓一些大學被認為是作弊，也讓大學有內部的評量。今天，在到 2020 年的研究評量過程的週期裡面，許多大學已經安排要去監督出版了（「產量」，以 REF 的話來說），並且利用「研究影響力管理員」，而用的文件術語相當迂迴且自我自設。

這些領域裡的決定都是被高階的委員會透過 email 或是座談會所形成的。Ben Martin 教授 (Sussex 大學) 在評論這些發展的時候說到，「不滿、犬儒、噤聲的出現」是被 Times 大學的工作調查所肯認的結果，而調查發現雖然學者都認為自己的工作是很有報酬的，但是 3/4 則深深的受到未來計畫和高階的領導的作為感到幻滅。調查也發現一半的學者擔心那些程式為基礎的評量指標重複性，也有一半的人認為他們的大學為了招收學生而降低的錄取標準，而且作為個人，他們覺得有壓力去給高一點的成績。

在這個脈絡下，Warwick 大學的社會學副教授 Charles Turner 最近被認為是個

「會毀了學校的問題」：大多數的資源被不必要地花費在建築物上而非圖書館。把 20 年前只會被排在後面的課程變成數一數二的必修課。把一些主修變成很重要，但是主修本身卻很難成為重要。以及無止盡的無意義的文章發表，正常的人不會想寫也不會想讀 (The Guardian, 2016/6)。

➤ 社會學位置的改變

社會學在英國大學裡面很晚才成為一個學科的。在 1960 年代只有 3 個社會學系所或中心存在。後來則是在系所數量上有了快速的成長，然後社會學成為是大學裡重要的學科。而這個快速的成長包括了高度的「開放」，而有一些人試圖要建立專業的界線的。而開放的風氣讓社會學思想貫穿了許多的領域。然而，這樣的開放也讓一些領域飄到了其他學科裡面。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工作社會學」和「教育社會學」。現在這兩個學科是商學院和教育學院在負責的。

社會學其他方面已經改變了。在經過了 1960 和 1970 的時候的激進轉向，一些專門領域變成了獨立的學科，像是犯罪學。這是個高度需要的議題，並且在跨學科的學院像是社會政策或是法學院裡面教授。健康和環境領域也是社會學可以發展應用課程的地方，學生也需要這樣的課程。這些改變加上研究重心轉向詮釋和認同，讓一些人認為物質結構的權力和限制被低估了，削弱了社會學回應到當代事件的能力。

類似的問題也被現在的大學和 REF 研究議程所提出過。機械的評量指標和對於「四個三星或四星」的績效的需要已經讓出版傾向期刊文章而非書籍，以及短期的田野，好配合評量的過程。一些學者可以調整去適應，有人則放棄了。許多人已經提出了這種評量對於那種需要和田野對象建立長期關係的學者的影響。更普遍的說，REF 裡面特定主題所謂的「績效表現」反應且影響了學科整體的地位以及在大學內被看待的方式。值得一題的是，在 2014 年，有 62 的送件包括了 1302 個者選擇了「社會政策」的類別。這個比例反應了有更多的研究者轉向了應用的領

>>>

域。結果，該主題被強迫要去報告說「只能代表了學科的部份」。

課程的「影響」是這之中的核心。因為這套公式鼓勵研究者去和外部機構合作，許多學者便相信有些重要的研究是會被排除和被給很低分數的。雖然有空間去做重要的研究（例如，環境議題），但是「影響」指標意味著偏好小規模的政策變化，導致大學必須積極鼓勵學者去保守做研究。ESRC 本身就是政府仔細審查的對象，因此便把研究資金集中在大型那種必須整個大學成立一個研究團隊才可以達到的計畫。這個政策讓小計畫都被忽略了。

這些變化在過去 30 年之間轉變很多。今天我們似乎到達了一個危機臨界點，這提出了許多關於公共大學的問題，現在的政府政策似乎傾向成立新的私立大學，這只會進一步激化教育領域的競爭。

所有這些都提出了困難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給大學的未來和目的的，也是給社會學在大學中的位置的。重要的是，社會學家已經表現出很強烈對於這些改變的質疑了。John Holmwood 便是帶領去強

調公共大學在英國重要性的人。這麼做需要另外的政策議程。而「替代的高等教育白皮書」也在 London 的一次主要會議中發行了。他指出了對於學生和研究所帶來的威脅是如何透過營利的機制進到了高等教育，並且引用了 1988 年由 802 所來自世界各大學所簽字的 Magna Charta Universitatum：「大學是自主的機構，必須在道德和知識上獨立，不受政治和經濟權力的干預。」當現在學術自主越來越倒退的時候，這個目標顯得格外的重要。■

來信寄給 Huw Beynon <beynonh@Cardiff.ac.uk>

> 加拿大的「社會學戰爭」

by Neil McLaughlin, McMaster University, Canada, 和 Antony Puddephatt, Lakehead University, 加拿大



在加拿大總理Stephen Harper說不要「commit sociology」去理解恐怖主義但是要對恐怖主義強硬起來之後社會學家所發放的鈕扣。

在21世紀之交，許多資深學者擔憂加拿大的社會學走向。Bruce Curtis 和 Lorna Weir 認為英語的加拿大社會學「缺乏對於社會學技藝、知識品味、公共關懷的深刻認識」。作為加拿大創始的社會學家並且接近退休，¹他們擔心學科的未來。Robert Brym 提出了對於加拿大社會學會會員的減少之憂心，²擔心整體學科的健康。Neil McLaughlin 透過研究更廣泛的制度因素，警告「加拿大社會學的危機」，³希望產生更反身的回應，開始建立廣泛包容的制度和學科視野。這樣的討論被稱之為「社會學的戰爭」，持續到了十多年後的今天。

Pat O' Mally 和 Alan Hunt 認為 Curtis 和 Weir 對於學科式微的擔憂是在「獵巫」，設定學科的限制然後監視處罰那些可能犯規的社會學家。⁴McLaughlin 的「危機」一文則從理論和經驗的角度挑戰前述的觀點。雖然這些辯論有助於脈絡化加拿大社會學，⁵不過卻越來越激烈。所以，當加拿大準備要主辦 ISA 世界大會的時候，我們應該對於這些辯論有所反思，並且討論那些可能對其他國家來說也很重要

的議題，特別是在美國脈絡之外的議題。

許多對於加拿大社會學得擔憂圍繞在會員的減少和國家學會的出席率降低。英語加拿大社會學年會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大會的部份，參加者來自各國不同領域。加拿大社會學會議的出席率很低，特別是資深學者都不太出席。這是學科的式微嗎？⁶Jean-Philippe Warren 提醒我們許多其他國家的學會也有相同的問題。以 Robert Putnam 的「獨自打保齡球」的論點來說，Warren 認為網際網路增加了人們跨越地理界線的溝通機會，所以學者可以「獨自做社會學」，不用參加傳統形式的會議。

然而已有一些弱點的象徵。在2000年代早期，當社會學仍然處於低地位的時候，不論在大學或是社會上都是式微的。許多這些議題至今還是相關的，而且可能對於其他國家的社會學來說很常見，但是在加拿大這用特殊的方式再現出來，這是因為特殊的歷史，和美國、英國、法國不同的關係所導致。

對於美國的知識霸權的憂心激起了1970年代和80年代加拿大化的運動。社會學家試圖去開創一個更自主的

>>

加拿大社會學，透過增加加拿大的研究和本土的師資聘用。可是，這個運動也產生了對於美國社會學的負面情緒，包括了批評美國但是卻忽略自己的缺點。⁷

當然還是有理由去擔心加拿大本土研究的缺乏，這也是許多國家的社會學所面臨的。加拿大社會學家越來越接受美國訓練的博士，並且不建立本土的典範像是 John Porter 或是 Wallace Clement，然後去支持更全球導向的理論家。⁸而特殊的加拿大傳統越來越被吸收到其他加入全球研究的範圍裡面（歐美）。

Ralph Mathews 已經努力去重建更加拿大的社會學，並且透過 Harold Innis 的「釘書針理論」，⁹這是一個重要的加拿大理論家，他認為加拿大都市的地理發展和資源經濟的貿易路徑是緊密結合的，開創了非常不同的地理區域和多元的文化。延伸這個框架到更新的當代關懷，對於石化產業和環保，First Nations 民族的權利，我們更了解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和社會學傳統有多特殊。然而加拿大的特殊或許也可以作為一個很好比較其他國家在面對全球化和保留地方脈絡的議題的參照點。

加拿大的社會學是很年輕的學科，只在 1960 和 70 年代制度化，而且有著很強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因為學科創立時是在社會和政治衝突最激烈的時候。這個「批判」的元素仍然存在，帶到了政策和政治介入的走向，反對保守的政治。例如，總理 Harper 忽略對於要投入更多對於恐怖主義的研究，聲稱「這不是做社會學研究 (commit sociology) 的時機」。對加拿大社會學家來說，這是在挑戰社會學的價值，讓加拿大社會學社在 2015 年製作了印有「Commit Sociology」的 T 恤作為抗議。

這個加拿大長期以來的批判基礎創造出了一批相當接受 Michael Burawoy 對於公共社會學之呼籲的讀者和觀眾。¹⁰有許多加拿大社會學家表態支持，也有人認為 Burawoy 做得還不夠。¹¹也有學者對公共社會學並不買帳。Scott Davies 提出要「學科離婚」，就是要在社會科學和批判理論之間做個抉擇。¹²加拿大的女性主義者認為 Burawoy 的呼籲忽略了私領域和政府之間的合作是有可能一起處理重大社會議題的可能性的。¹³

而且的確，當我們從 Harper 政府的極度保守政策轉向 Justin Trudeau 的自由主義，政府介入去處理公共議題，特別

是 First Nation 民族的相關議題，其機會是增加的。社會學家可以期待一個更公共的社會學在加拿大誕生，這是一個和國家有這重要關係和持續對話的領域。

當今天社會學戰爭繼續的時候，William Carroll 最近對於學科的地位感到相當憂心，認為包括其他的社會科學領域都應該建立跨學科的研究網絡，並透過批判實在論去連結起來。¹⁴事實上這篇論文得到了 2015 年加拿大社會學評論的最佳論文獎，因為它反應了底下的真實文化，許多的加拿大社會學家是傾向去拒絕僵固的學科認同和信念的。

這導致了一系列的阻礙。對於有些人來說，雖然他們接受比較開放的知識觀點，但是並不願意去放棄各自的學科優勢。許多人認為最近最好的研究都打破了主流受的歡迎的見解——學科是故步自封的、監視知識分子的。但是其實不同學科之間的知識分享是很有效率的。¹⁵雖然不同學科之間可能鈍化知識生產，但我們也不能忽略有證據顯示它們也是彼此增進的。¹⁶我想，與其在完全單一學科（過度誇張）和完全跨學科（過度理想化）之間做二擇一，最好的或許是在不同學科典範之間來回辯證，承認妥協的存在，不會落入兩者的極端之中。¹⁷

雖然對於學科的反思是有用的，但是那也有可能演變成修辭和意識型態的爭辯，反而偏離了我們真正要重視和執行的經驗社會學研究。不過也是有人研究加拿大社會學的學科本身。Rick Helmes-Hayes 最近研究了加拿大社會學在 20 世紀的神學根源，¹⁸以及 Bruce Curtis 也追溯回到更早，把社會科學連結到了 19 世紀的「國家打造」。¹⁹新的量化研究也只指出了我們外國和國內聘用師資的變化，²⁰以及我們的研究，這都顯示了我們學科的認識論多元性和理論長期來的變化。²¹在過去 10 年似乎有在理論上往 Pierre Bourdieu 聚合的趨勢，因為 Bourdieu 幫助搭起了英語和法語學界的橋樑。²²那我們面向未來的時候，經驗的辯論也很歡迎這種「社會學的社會學」主題，因為這讓我們不會自戀，並且更根植於經驗，建立反身性的制度。

當加拿大的「社會學戰爭」已經如火如荼展開的時候，並且也導致了一些「個人的損傷」，但是總體來說是有建設性的。資深的學者已經重新進入這個場域，並且幫助年輕的學者可以進到正面的視野裡面。而參加我們會議的人數一直增加之中，這

>>

也讓各種研究群體蓬勃發展，部份也是受到了ISA的影響。而且有更多的法語場次，而加拿大社會學評論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的主編 François Dépelteau 就是說法語的。總之，我們的學會也有強韌的女性主義社會學，主要是被 Dorothy Smith 和其他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所激發的。此外，新的研究綱領也主要在去殖民和肯認，還有 First Nations 的原住民群體也拓展了許多需要且和公共社會學相關的議題。

加拿大社會學會期待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學家到2018年的ISA世界大會。我們期待去增進彼此的對話和理解，以及反思我們多元的全球社會學，也期待可以在比較的脈絡中相互學習，成長。■

來信寄給 Neil McLaughlin <ngmclaughlin@gmail.com>

註 1 : Curtis, B. and Weir, L. (2002) "The Succession Question in English Canadian Sociology." *Society/Société*, 26, 3.

註 2 : Brym, R. (2003) "The Decline of the Canadia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8(3): 411-416.

註 3 : McLaughlin, N. (2005) "Canada's Impossible Science: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Coming Crisis in Anglo-Canadian Sociolog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0(1): 1-40.

註 4 : O' Malley, P. and Hunt, A. (2013) "Does Sociology Need to be Disciplined?" *Society/Société*, 27(1).

註 5 : See volumes 30(4) and 31(1) in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for the main comments on McLaughlin's "crisis" article, and his reply (2005-06).

註 6 : Warren, J-P (2006) "Sociologizing Alone? Is Anglo-

Canadian Sociology really Facing a Crisis?"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1(3): 91-105.

註 7 : Cormier, J. (2002) "Nationalism, Activism, and Canadian Sociolog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33(1): 12-41.

註 8 : Warren, J-P (2014) "The end of National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The Fates of Sociology in English Canada and French Quebec in a Globalized Field of Sc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50: 87-108.

註 9 : Mathews, R. (2014) "Committing Canadian Sociology: Developing a Canadian Sociology and a Sociology of Canada."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51(2): 107-127.

註 10 : Burawoy, M. (2005) "2004 Presidential Address: For Public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 4-28.

註 11 : See a special issue on this, edited by Rick Helmes-Hayes, and Neil McLaughlin (2009) "Public Sociology in Canada: Debates,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Context."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4(3): 573-600.

註 12 : Davies, S. (2009) "Drifting Apart?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awaiting Public Sociology in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4(3): 623-654.

註 13 : Creese, G., McLaren, A. and Pulkingham, J. (2009) "Re-thinking Burawoy: Reflections from Canadian Feminist Sociolog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4(3): 601-622.

註 14 : Carroll, W. (2013) "Discipline, Field, Nexus: Re-visioning Sociology."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50(1): 1-26.

註 15 : Jacobs, J. (2013) *In Defense of Disciplin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註 16 : Curtis, B. (2016) "The Missing Memory of Canadian Sociology: Reflexiv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al Science."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53(2): 203-225.

註 17 : Puddephatt, A. and McLaughlin, N. (2015) "Critical Nexus or Pluralist Discipline? Institutional Ambivalence and the Future of Canadian Sociology."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52(3): 310-332.

註 18 : Helmes-Hayes, R. (2016) "Building the New Jerusalem in Canada's Green and Pleasant Land: The Social Gospel and the Roots of English-Language Academic Sociology in Canada, 1889-1921."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1(1): 1-52.

註 19 : Curtis, B. (2016), *ibid*.

註 20 : Warren, J-P (2014), *ibid*.

註 21 : See Joseph Michalski, "The Epistemological Diversity of Canadian Sociology." *Forthcoming in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註 22 : Stokes, A. and McLevey, J. (2016) "From Porter to Bourdieu: The Evolving Specialist Structure of English Canadian Sociology."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53(2): 176-202.

> 回憶John Urry 及其研究



John Urry.

當你認識一個人很久以後，其實是很難把那個人和其研究分開來看的，而且或許也最好不要這樣做。John Urry 對於社會科學的貢獻不僅僅是透過發表，還透過了其行，為我們立下了典範。

他的例子告訴了我們，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研究者或是老師，其實沒有必要宰制，也沒有必要樹立一種讓人「敬畏」的人格或是艱澀的寫作風格。他總是對於名利毫不在乎，並且其幽默總是存在於其批判的心智和對於研究的高超品味。他比較有興趣去立，而不是破。他雖然批判，但是不吝澀。他可以用讓人接受的方式表達出他不同意的地方，而且不拐彎抹角，他總是鼓勵年輕人加入其知識追求的旅程，然後找出自己的獨特方向。

John 喜愛學期，在社會學種很熱切地開創新主題和新的思考方式，像是空間、時間、解組資本主義，觀光，自然、流動、氣候變遷，或是更特別的主題如 3D 列印。他對於忠誠於社會學始祖這種事情並不感興趣，但也對於各種理論概念抱持包容開放的胸襟。他有獨到的慧眼可以看到其他主流學者忽略的事情，像是觀光、多重流動、或是外包 (offshoring)。

我在這篇短文中沒辦法回顧他這些主題，所以我只會評論兩個時期：早期和晚期。我

>>

首先接觸到他的作品是 70 年代中期，那時我們的興趣是批判實在論、政治經濟學、社會理論和空間收斂。John 則另外一邊進入，那就是地理學。Gregory 和 Urry 的《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探討了這兩者的意義。晚期則繼續重新思考空間和社會的關係，這特別在其多重地方性(localities)，多重流動性(mobilities)，外包(offshoring)等研究中可以看到。

在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早期，許多英國社會科學都被馬克思主義所激進化，而 John 則是其中一個那些研究這些概念但是保持心胸開放、非教條的學者。同時，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會議則聚焦給了激進研究與討論，涵蓋廣泛的議題，每週的研討會帶來了不同的研究者和運動者，來自世界各國。這就是其中之一我遇到 John 的場合(CSE 地方主義團體)。所謂 Lancaster 地方主義群體是幾個英國研究群組中的一個，並且是用激進的理論去研究的。那些所謂的「地方性研究」是

被用來對抗資本主義變遷之辯論的，那時候大家稱當時是後福特主義。雖然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後者是金融化和新自由主義化發展的一個岔路，John 和其同事 Scott Lash 結合了理論和經驗的取徑，研究資本主義的各種面向和變遷，可見《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and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一書。

在他最後的 5 年內，John 發表了 3 本書，探討了一系列的氣候變遷，資源，社會的群組議題。他們包括了《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Societies Beyond Oil》，和《Offshoring》。像是 Scott Lash 所說的，John 總是對於社會未來特別有興趣，而最近他也幫助成立了 Lancaster 大學的社會未來研究院。

氣候變遷毫無疑問是人類社會當今最大的挑戰。雖然最近對於資本主義的未來的辯論沒有提到全球暖化，但是 John 是其中一位先驅的社會科學家提出石化在現代性發展中的影響，並且透過仔細思考一些氣

候變遷的意義和對日常生活的影響。雖然我們多數人透過歷史去往前看，但是 John 是向前看的。其他的世界，不論好或壞，都有可能，而且像是他顯示的，社會科學家可以也應該透徹思考和評量這些議題。在這個不穩定的危險時代，我希望更多人跟著 John 的腳步向前走。■

—Andrew Sayer,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國



社會未來研究院的會議， Lancaster, 2015。

1975 年的時候，John 和 Russell Keat 寫了《Social The-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and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一書常被引用且喜愛，並且影響了 David Harvey 和 Manuel Castells。該書討論了資本積累，但是論證資本主義的新階段不再被社會制度和組織所控制，反而是被社會解組所掌控。John 和我從不同的觀點一起做出了這個論證。

80年代晚期 John 和 Derek Gregory 編輯了《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主要的作者之一是 Doreen Massey 和其「再結構」的概念，包括了「價值鍊」的轉面。例如，價值鍊會追溯商品的源頭，像是南美的主要原物料，並且看其在墨西哥工廠裡的轉變過程，然後如何被送到歐洲或美國的市場。這些價值鍊是「延伸的」，他們在時空上連結了很遠的地方。這些就是 Giddens 所稱「時空距離化」。

或是 Harvey 的「時空壓縮」的經驗例證。

這就是全球流動社會學的更完整版，我和 John 在《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一書中處理的就是這個。Castells 已經開始處理從前社會結構到新全球社會的流動，包括各種流動，資本、勞動力、商品、環境污染，或是資訊溝通的壞東西。

John 發展出了「流動性社會學」，是其 90 年代晚期到後來研究和寫作的重心。他後來特別對於人如何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感到興趣，像是觀光，但是他所有對流動性的研究都包括了一章關於汽車流動性 (automobilities) 的研究。我們從汽車看到了這個世界，並從科技的角度來理解。

John 後來寫了一系列關於

氣候變遷的書，回到了那些「壞事」的 mobilities 或是流動的主題，這是一個和 John 的政治左轉同時發生的事情。我其實早期比 John 還左，但是他到了 2010 之後強烈的批判資本主義。譬如在他的書《Offshoring》中可以清楚看到。我記得有一次是英國研究委員會的會議，在上海舉辦，有許多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受邀，在場一位有名的法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是氣候變遷的懷疑者，John 已經 60 多歲了，但是仍神采奕奕地和這位 25 歲的年輕學者槓上激辯。

John 是一個未來的社會學家。我遇到他的時候我們都大概是 30 歲的時候。我們在接下來的 21 年內當了同事，且是一輩子的好友。Sylvia Walby 是 John 的另一半，說過 John

相當聰明，而且精力無限。我欠 John 所為他的充沛精力所作的一些節制。我想念他，而我們也都會想念他。■

— Scott Lash,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英國

> John Urry

不只是社會學家的社會學家



低碳排放創意論壇，深圳，中國，2016。

John Urry 突然的過世讓其家人、朋友、同事驚訝不已。他和我一開始是在 Cambridge 大學的研究所中認識的 (1967-1970)，我們分享許多興趣，也在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會議中互動很多，也在社會學圈中交手多次。我們在 1990 年變成了同事，那時我成為了 Lancaster 大學的社會系系主任。

John Urry 從 Christ's 學院 (Cambridge) 得到經濟學和政治學雙學位。那時他是由 James Mead 所指導，他是一位諾貝爾獎經濟學家。在那幾年中 John Maynard Keynes 的研究仍被當成主流，而其他的經濟學仍然屬於政治經濟學。John 後來在經濟學和政治學系中讀博士（那時沒有社會和政治科學的老師），處理的問題是相對剝奪和革命，由英國社會科學研究委員 (SSRC) 會獎學金所支持。這是在 Sir Keith Joseph 之前，也就是余氣爾夫人鷹派教育與科學的大臣，他看輕鄙視社會學，以及家庭貧窮的相對剝奪理論為劍，提議 SSRC 改名叫做經濟和社會研究委員會。幾年後，John 成為了社會學群的首席教授 (1998-92)，為社會科學大力辯護。1999 年，他幫助成立了英國的 National Academy of Academics, Learned Societies and Practitioner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改名為中央社會科學研究院)。

在 1970 年，也是他博士學位取得之前，John 開始擔任 Lancaster 的社會學講師。在 46 年的生涯中，他貢獻給了該系所一個強韌的研究

文化，並且透過其作品和制度的建立而得以可能。從「科技革命」的大洪流以來，以其 70 年代的左派思潮，大學已經變了很多，對於學者的要求也增加了。但是 John 總是可以維持其對學習的熱愛，其對於社會變遷的好奇心、享受追求知識的熱情，這些都結合到了其思考之中，不論是權力、社會理論、空間、時間、地方主義、地域主義、解組的資本主義、休閒和觀光、自然和環境、mobilities、全球社會的複雜度、能源使用和氣候變遷、都市設計、3-D 列印的社會影響，以及最近的未來的未來等等。許多這些興趣都在其社會未來研究所裡面被實現。

Scott Lash 和 Andrew Sayer 在其文章中已經描述了 John 的生活和研究。我想我最愛 John 的作品是他嚴謹和全面的《Social Theory as Science》，這本書是和 Russell Keat (1975, 2015 再版) 一起寫的。這不僅鞏固了他的理論軌跡而且也啟發了在社會科學哲學的研究。然而，John 總是對於理論和經驗的辯論保持敏銳，廣泛地詰問知識的貢獻、新的觀點、或是不尋常的點，以及可能的發展方向。他的興趣很廣，包括了連結到了自然和環境科學，有著很強的「後學科」取向，也是 Lancaster 社會學的特徵。這就是為什麼他有辦法可以在學科、典範、認識論之間遊走，可以和許多學者對話，鼓勵他們去追求他們的興趣和研究，並且提供看法，在這個知識的能力基礎上，這些互動有辦法更新和拓展開來。

有許多方式可以成為一個傑出的社會學家。John 擅長於多數的這些方法。但是他從來不追求名位，並且基於其知識分子的精神而對權力敬謝不敏。他總是抱持批判性，也總是為同事和學生提供熱情的支持。可是，持續 Alvin Gouldner 對於組織認同的區分的話，他則是一個「普世主義」者，有著全球知識的貢獻。他的興趣和研究拓展到的自然和社會的世界，而影響可謂無遠弗屆。

John 是社會學家的社會學家，因為他知道和尊敬社會學的技藝，並且致力於發展之。他被認為是具有前瞻性的創意的人，也致力保護這個學科免於受到政治的迫害。而且他有強韌的知識分子精神，這和一般的專業社會學家總是侷限在很狹小的領域中不同。他總是有無限的好奇心，把很多不同的領域結合在一起，並且刺激了許多新的領域的發展和政策辯論。的確，他是在這個學科的前沿工作的，不論是理論和經驗上的是如此，所以很令人驚訝的是他居然可以完成那麼多成就，包括自己的研究，合作的，國際的，還有研究管理，並且和審查者之間的談判，以及為社會科學的推動而奔走。也令人驚訝的是他在這麼多產的情況下還可以保持慷慨、隨和、和幽默。

John 也有一個英雄般的心靈與信念，像是 C. Wright Mills (1959 年「社會學想像」一文的作者)。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要說真話是需要冒著風險的，因為有可能會錯。但最近幾年他變

成了公共知識分子，介入許多關於社會和地球的議題的辯論。總是，他是很棒的同事，而他的影響則會永遠持續下去。■

- Bob Jessop,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國

> 鄰近與流動

紀念 John Urry



「未來的城市：聰明或幸福？」會議，Lancaster, 2016。

英國社會學家 John Urry 在 3 月的時候過世。那時，我們其實才正在慶祝我們一起寫的文章「推動新的社會流動典範」發表在期刊《Applied Mobilities》。這篇文章我們主要是評估社會流動典範在社會科學過去十年的影響，我們也才正在寫一篇要投到 Current Sociology 的文章，討論「流動轉向」和「空間轉向」之間的關係。我覺得很幸運的是有機會可以和 John 討論這兩個主題以及與社會學的關係。

我在 1998 年加入 Lancaster 的社會學系，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John 在那裡。John 有辦法吸引到許多研究生、博

士後、訪問學者、新進教師到西北英格蘭的能力，所以形成了一個很成夠的跨學科研究環境。在寫了許多 mobilities 相關的文章之後，我們一起於 2003 年在 Lancaster 成立了流動研究中心。而接下來的幾年，我們也舉辦了另類流動研究的未來研討會，並和 Kevin Hannam 設立了期刊 Mobilities，也一起編輯了《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的特輯：「materialities and mobilities」，還有《Mobile Technologies of the City》。這些基礎之上，我們強調跨越空間的思考，模糊學科邊界，探討物質性和時間性，並且超越國族和社會的架構，研究「mobilities」如何為一個更開放、廣大、包容、生動的社會

科學做出貢獻。

我也很感激的是，最近的對話中，John 回顧他對於流動的興趣如何根植於社會理論中的空間轉向，主要是從 Lefebvre 的 1947 年的《La production de l'espace》，以及英國由思想家 Doreen Massey 所發起的辯論（也很不幸地最近過世了）。Massey 的 1984 年的書《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是探討複雜多變得資本運動如何形塑改變了空間結構。這書是在 Gregory 和 Urry 的 1985 年的《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這本書綜合了 Harvey, Giddens, Massey, Pred, Sayer, Soja 和 Thrift 的貢獻，並啟發了 John 的所謂「人們進出空間的休閒」的轉向，並在

《The Tourist Gaze》(1990) 一書中有所闡釋。另外，多重流動和其空間的結果也在 Lash 和 Urry 的《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1987) 和《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1994) 書中有所討論。John 早期著作《Social Theory as Science》(1975, with Russell Keat) 和《The Anatom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1981) 也有重要的理論貢獻，為他後來的研究奠定的基礎。1990 年代中期，Castell 的 1996 三部曲，網絡社會讓空間的流動和網路等概念的理論化成為顯學，而 mobility 也變成了關鍵詞。

John 的《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幫助後來的 mobilities 成為空間社會學或是「流動社會學」中的主要概念，這是一個在過去 15 年來越來越有影響力的取徑，至少在美國以外是如此。

這個轉向強調 mobilities 的趨勢和期刊「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and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由 Polity Press 於 1980 年的出版是同期興起的。John 稱這個期刊是 Thatcher 政府對於大學和縮減社會科學的政策回應，然

後試圖去發展後學科劃分的社會科學和社會理論。

John 也描述自己的研究是對於美國社會科學和「英國經驗主義」的對抗。照我看來，在美國，John 的這種反實證主義的批判理論可以解釋為什麼美國社會學會和許多主流社會學系所並不情願去納入這種新的 mobilities 典範，但我覺得這個典範是批判理論和後學科劃分的社會科學的一道未來的曙光。

儘管這個「新典範」的宣稱或許有點過於自信，但是 John 本人是很謙虛的，從來沒有炫耀自己的成就。John 的個人立場是完全反對精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他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中可以看到，從他的穿著總是藍色上衣，藍色夾克，藍色褲子，然後總是沒有打領帶。他是個平等主義者，對於炫耀、階級、地位等一點興趣也沒有。他歡迎世界各地來的學生，總是笑容以待，並且總是讓那些學生有容身之處。

John Urry 開啟了一種新的流動社會學典範：這個典範超越了學科邊界，讓新的知識得以形成，並且讓社會學可以透

過探討重要公共議題去更新期對於這個社會的相關性，這個努力包括他最近討論氣候變遷，資源榨取，黑暗經濟等議題。新的流動典範和 Urry 的研究繼續站在美國和英國量化研究的對立面，並切對抗學術體制的階層、專業化、還有新自由主義大學導向。社會學將會站在他的肩膀上繼續奮戰。■

—Mimi Sheller, Drexel University, 美國

> 學生運動反對性暴力

by Ana Vidu,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ISA經濟與社會委員會 (RC02), Tina Schubert, Loyola University Andalusia, ISA女性與社會委員會(RC32)¹



Arbu繪圖。

California 大學 Berkeley 分校長期以來對於性騷擾和性侵害的辯論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不只是因為其類似事件有著不尋常的數字，也是由於該校回應的方式的緣故。很不幸的是。這個問題在多數大學裡面普遍存在著，Berkeley 大學作為許多大學處理該問題的學校之一，其對抗性騷擾的學生動員是相當有名的，這種學生運動也已經在其他學校開始了。

Berkeley 分校的反對性別暴力的學運扮演的角色是先驅的角色。這個議題主要首先在 70 年代晚期開始出現，當時社會系學生組成的女性反性騷擾組織 (WOASH)，這群女性代表了 13 個女學生對於一位社會系教授的控訴。這個事件為美國高等教育中的性別暴力議題打破了沉默，而且也為反校園性騷擾的運動開啟了第一個先

例。

1979 年由 WOASH 所發起的聯邦控訴案讓大學採用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作為防治性騷擾的架構。但是 WOASH 並沒有因此停止。2 年之後，其開啟了第一個給新進學生的校園導覽，讓新進學生知道如何面對和處理校園性騷擾，然後也提供受害者諮詢和協助。

1990 年之前，申訴的數量、政策數量、給受害著的資源數量、處理性騷擾案件的單位的數量都有了顯著的增加。2003 年，「No means no」被引進到「犯罪性騷擾法案」，為的是去成立「同意」必須是性行為的前提。

在 2010 年代早期，學生運動者申訴，認為大學並沒有認真處理投訴案件，違反了 Title

>>

IX。這個申訴對象是所有的美國大學無法保護學生免於受到性騷擾。2013 年，California 議會要求 Berkeley 重新檢視性處理別暴力的相關政策。一年後，也就是 2014 年，學生推動「Yes means Yes」的同意法案，要求性關係中必須要有「確認、有意識、自願的同意」，認為受害者其實很難總是有辦法說出「no」的。

2015 年，學生運動變得越來越重要，開啟了團結的脈絡和校園社群的支持，並鼓勵了大學師生去反對性別暴力。最近，從教師和系所而來的壓力 Berkeley 一位太空學的諾貝爾獎教授因為多年前的性騷擾案例而被迫辭職。在那之後，學校成立了委員會專門處理教師被投訴性騷擾的案件。

美國校園反對性暴力的抗爭包括了社會動員和法律變革。WOASH 的 1979 年抗議的重要性在於開啟了脈絡，發聲，然後提出法律訴訟。這些抗議也幫助改變了校園文化，喚起意識，開創了尊重的校園文化和對校園性騷擾的零容忍。現在，校園性騷擾已經廣泛被認為是問題了，這改變讓受害者可以從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得到支持。

學生運動者持續去挑戰和改善 Berkeley 校園的政策，讓大家可以看見，像是在校園入口，學生可以發表其擔心的問題。甚至在去 Berkeley 的巴士上也可以聽到大家討論此議題。校園中，學生抗議的身影也常出現，還有印有相關字樣的襯衫反對性別暴力，以及性騷擾議題的課程也已成爲常態。學生報紙也會刊登最新的性別暴力新聞在頭版。

在美國，反對性騷擾的運動已經興起許久，不論是全國或是地方會議，或是全國性的組織，都已經頗有規模。一個知名的運動是「終結校園強暴」，是由被害者和運動者所組成。其他孩包括了 California 電視節目「審視性騷擾」。有一部紀錄片叫做「狩獵場」。一部小說叫做「一次又一次」。而美國政府則成立了一個網站叫做「妳不孤單，一起反對性騷擾」，提供資源、資料、法律、資訊給學校、學生、和所有關心該議題的人。而白宮和國家校園領袖委員會推動了「It's on US」運動去喚起意識，去防治這個國家層級的問題。政府稱要去「採取行動」，不袖手旁觀，而要解決問題。「It's on US」主要目標是去改變性操擾的校園文化，然後提供資源給受害者。

那些由 Berkeley 學生和其他大學所採取的行動不只改變了制度對於性騷擾的回應，也影響了學生的全球動員。如前所述，受害者強大的團結網絡是最關鍵的，也將會加速這個運動的進展。例如，在西班牙，儘管官方的漠視和加害者的報復，學生運動在過去幾年已經發展了起來。「校園性暴力受害者網絡」推動了西

班牙校園內的學生運動。可是，至今還是只有很少的教師參與，若是參與，會被報復。該網絡是由運動者和受害者一次對於一位教授的性騷擾所提出的控告而開始的，而面對制度的忽視，這些人決定要動員自己，聯絡媒體，並成爲其他受害者的支持網絡。該網絡行動被西班牙的健康、社會、平等部門視爲是最佳的實踐。

美國的性別暴力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在西班牙和其它國家的校園內響應了起來。這樣的運動伴隨著公眾的支持，將會爲下一代帶來更好的校園。■

來信寄給 Ana Vidu <ana.vidu@ub.edu>
和 Tinka Schubert <tschubert@ub.edu>

註 1：這篇文章的研究執行於 Ana Vidu 訪問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和 Tinka Schubert 訪問 Graduate Center of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期間。

> Mondragon 的第三條路

回應Sharryn Kasmir

by Ignacio Santa Cruz Ayo,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西班牙, Eva Alonso,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西班牙



Mondragon鎮上的壁畫。Christian Weber攝影。

這個批評總是包含兩個元素：第一，臨時工的大量增加和非合作社子公司的全球擴張。這篇文章中，我們則提供一些資料，要說明：和放棄合作社的原則剛好相反，Mondragon 的成員把這些挑戰視為是強化和增進期運作模式的機會。我們的研究指出了合作社的第三條路，這條路也是非資本競爭模式的第三條路。

超過 60 年來，Mondragon 開創的工作的品質和持續一直是主要目標。其 2014 年的年度報告中指出 Mondragon 有 263 個組織，包括 103 個合作社和 125 家生子公司。加起來看，Mondragon 總共有 74117 個工作。歷史上來看，Mondragon 是可以在經濟蕭條時期開創就業機會和持續保有品質的，可以的話，許多還是永久的工作。今天有許多的非合作社工作則可以在三個領域中找到：分配部門，西班牙企業子公司，國際企業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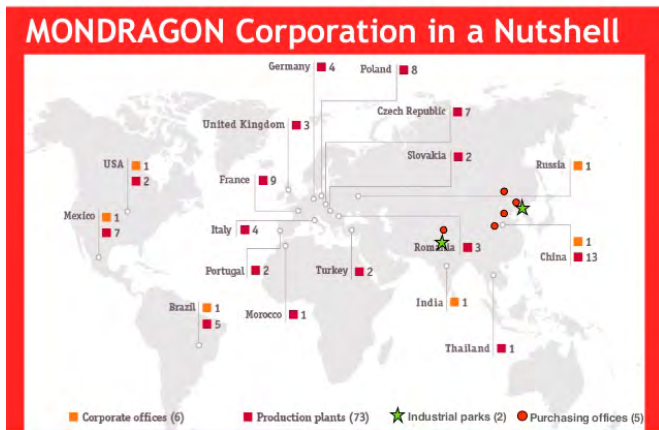
Mondragon 使用三個策略去將臨時工轉變成合作社工人。在分配部門，Mondragon 使用 EMES 計畫 (Estatuto Marco de la Estructura Societaria)。其分配部門的子公司 Eroski 吸收了另外一個資公司 Caprabo，然後結合兩者個超市。2009 年 Eroski General Assembly 採行了 EMES 計畫，其工人都有機會成為合作社工人。雖然這個計畫還在執行，但是 Eroski 則處於艱難狀態，虧損連連，現在則在進行內部重組和減少債務。所以這個領域不是一個很好把臨時工轉變成合作社工人的地方。

第二個策略包括了把企業子公司轉變成混合型合作社，讓工人可以成為合作社成員。這個計畫唯有在子公司可以行的情況下才得以可能。另外，這也要合作社和資公司的工人都有意願才行。這案例發生過幾次：Maier Ferroplast

>>

作為研究合作社的學者，我們想要謝謝《全球對話》所開啟對於合作社的辯論，並且讓我們可以有機會回應 6.1 期 Sharryn Kasmir 對於 Mondragon Cooperative 的評論。

批評者對於合作社，特別是西班牙知名的 Mondragon 合作社的批評通常這麼講：「在面對競爭之後，合作社會墮落成資本家，或是資本家的資助者。」Mondragon 很清楚的並不是資助者，但是許多包括 Kasmir 在內批評者則是認為 Mondragon 已經成為資本工廠，工作環境惡劣。



Mondragon 合作社的全球布局。

Limited 屬於 Maier Cooperative Society (2012); the Victorio Luzuriaga Usurbil cooperative (2004); Fit Automotive (2006); 和 Victorio Luzuriaga Tafalla cooperative (2008)。這些案例都並非特殊或罕見案例。

第三的策略是關於 Basque Country 之外的子公司。Mondragon 已經成立了許多國際子公司去幫助母公司工作的品質和穩定。從這點來看，這個策略是成功的，因為海外公司甚至開創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和許多批評者見解相反的是，數據顯示了有越來越多工人成為合作社成員。Altuna (2008) 指出，2007 年成員佔了 29.5%，但是 2012 年則增加到了 40.3%。

2003 年，Mondragon 的第八議會決定該公司的主要目標是擴大合作社價值，推動參與（管理、資本、獲利），透過延伸企業管理模式到 Mondragon 的國際子公司。雖然這項努力開始了，但是還有很多障礙。這些公司的合作社轉型包括了許多經濟、法律、文化、投資等的障礙 (Flecha and Ngai, 2015)。例如，許多國家的法律架構並沒有承認合作社，許多工人沒有資源成為合作社成員，而在許多子工廠。許多工人並不了解合作社。(Flecha and Ngai, 2015) 的文化在 Basque Country 的興起經過的 60 年，世代相傳才得以可能。不過，也是有成功的案例。例如，Angel Errasti (2014) 描述了把工會代表結合到波蘭 Fagor Electrodomeísticos 的資公司的管理議會之中，這代表了工人參與的成功案例。

Mondragon 提出了許多複雜的問題，包括了合作社的角色如何對應到競爭的資本經濟體系之中。Mondragon 的合作社是必須在競爭的環境下生存的，所以若是不走向國際，那麼就會喪失開創更多工作的機會。雖然合作社是少數，而資本家設定了遊戲規則。但這並不表示資本主義是唯一的全球經濟選項。Mondragon 已經告訴了我們合作社也可以國際化。當子公司成立在國外之後，Mondragon 會優先去包攬在地合作

社的工作，而不是把工作移到海外。

Mondragon 已經成功地維持了比其他合作社或是資本廠較好的工作環境。這點，就連那些對於 Mondragon 的批評者也是承認的，而且合作社成員也都希望那些資公司的工人能擁有好的工作環境。這個開創高品質和永續的工作的原則也被應用到國際的子公司。因此 Luzarraga and Irizar (2012) 顯示，除了遵照國家和在地的管制，Mondragon 的資公司已經改善了工作條件，像是工資和訓練。雖然 Mondragon 的合作社運動無法獨自打敗全球資本主義，但是它會負起歷史的責任，為其員工開創一個更好的世界。

來信寄給 Santa Cruz Ayo <Inaki.SantaCruz@uab.c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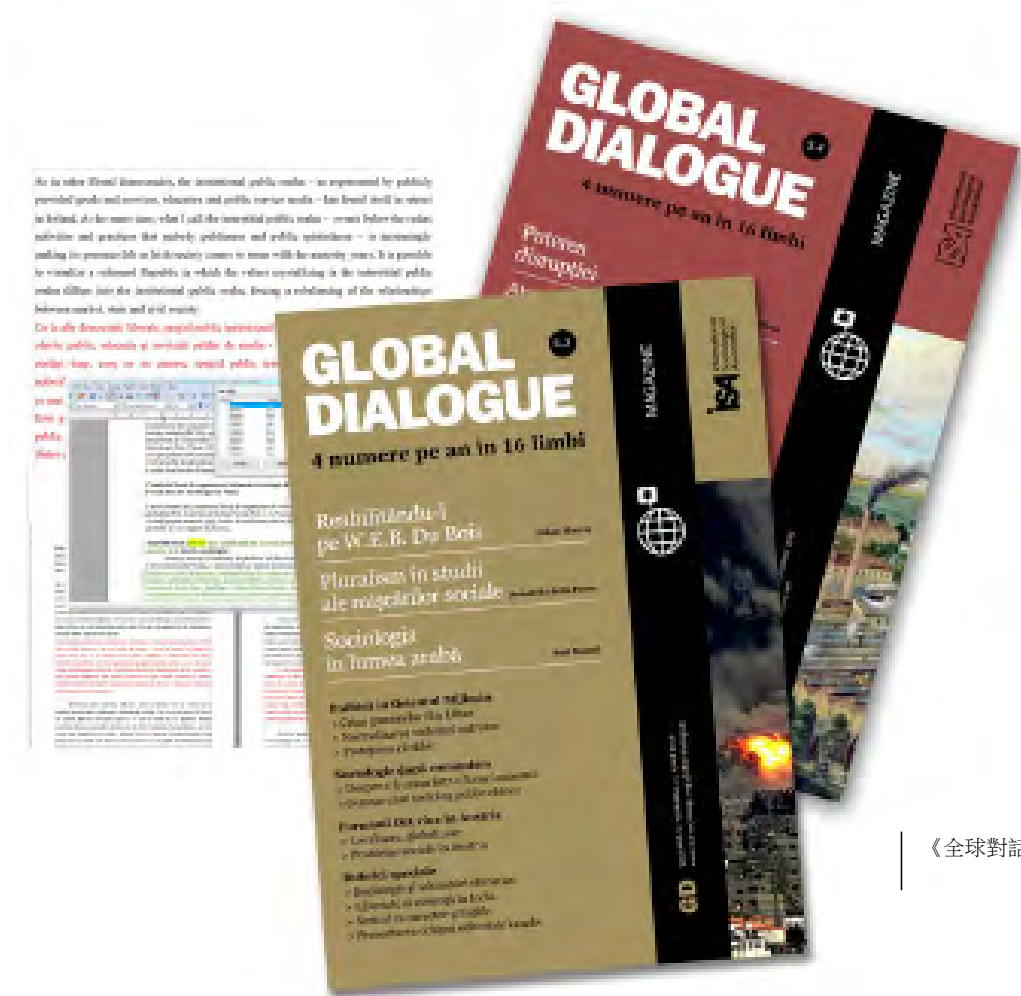
和 Eva Alonso <eva.alonso@ub.edu>

References

- Altuna, L. (ed.) (2008) La Experiencia Cooperativa de Mondragón, Una síntesis general. Eskoriatza: Lanki—Huhezi, Mondragon Unibertsitatea.
- Errasti, A. (2014) Tensiones y oportunidades en las multinacionales cooperativas de Mondragón: el caso Fagor Electrodomeísticos, Sdad. Coop. Revesco: Revista de Estudios Cooperativos, 113: 30-60.
- Flecha, R. and Ngai, P. (2015) The challenge for Mondragon: Searching for the cooperative values in tim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rganization, 21 (5): 666-682.
- Kasimir, S. (March 2016) The Mondragon Cooperatives: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Global Dialogue 6.1.
- Luzarraga, J.M. and Irizar, I. (2012) La estrategia de multilocalización internacional de la Corporación Mondragón. Ekonomiaz, 79: 114-145.

> 《全球對話》 的羅馬尼亞翻譯團隊

by Costinel Anuta, Corina Bragaru, Anca Mihai, Oana Negrea, Ion Daniel Popa, 和 Diana Tihan,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羅馬尼亞



《全球對話》的羅馬尼亞翻譯的挑戰。

這篇文章描述《全球對話》羅馬尼亞翻譯團隊的誕生和組成，並且著重在發展和工作的過程，以及團隊的特殊之處。

羅馬尼亞編輯團隊一開始是由 Marian Preda 教授所帶領的研究生團隊所組成，是其訓練博士生的一部分，還有 Cosima Rughini 教授和 Ileana-Cinziana Surdu 教授幫助了整個過程。Ileana 領導了整個團隊的每一步，為現在的運

作模式奠定了基礎。

在接到了《全球對話》的英文版之後，團隊會寄邀請信給團隊成員和 Bucharest 大學的社會學研究生。而最吸引人的動機是可以提供社會學閱讀和翻譯的實際訓練和實做經驗，另外還有給那些已經翻譯五期以上的人 ISA 免費學生會員的優惠。

在英文版文章放到 Dropbox 上之後，文章

>>

會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內被翻譯出來，每一位翻譯者會負責一定數量，大概 4 到 10 頁不等，依每期的狀況而定。第三週包括了相互審稿，每一位翻譯者校稿其他文章，並且英文和羅馬尼亞文的文章會一起比較，是為了要可以傳達原稿的原意和風格。第四週由一位新的成員校閱每一篇文章，要去讓文章之間可以相容（像是引用格式，以及同義詞的選擇），然後最後，團隊整個編輯和校閱羅馬尼亞版。

當然事情不總是像上述那麼順利，每個成員還是要去學習社會技巧，像是耐心和容忍。最棘手的挑戰是把英文翻譯成通暢自然的羅馬尼亞文。有些時候我們必須去創造相容的詞彙去翻譯那些新的概念，像是在 5.4 期中出現過的「trickle-down」經濟，這個挑戰是因為英文（日耳曼語系）和羅馬尼亞文（拉丁語系）結構上的差異所導致，譬如兩種語言會用完全不同的文法和文字順序。過程中常會出現對於翻譯上的激烈辯論，但這是很好的機會去讓我們翻譯得更好。有些時候我們會找不到對應的翻譯，不過當有人提出證據證明之前已經被翻譯過了以後，大家就會停止爭辯。因此翻譯的挑戰以兩種方式幫助了我們的團隊：它增進了我們的語言流暢度和對社會學知識的了解。不過為了在截止日期完成翻譯，團隊必須在各自

的工作和翻譯之間找到平衡，這是另外一個挑戰。

《全球對話》涵蓋的各種主題，我們的團隊也需要在學術和在地的文化之中去來回碰撞。透過整個翻譯的過程，每一位成員的熱情、興趣、決心，讓羅馬尼亞的翻譯更加專業。■

來信寄給

Costinel Anuța <costinel.anuta@gmail.com>

Corina Brăgaru <bragaru_corina@yahoo.com>

Anca Mihai <anca.mihai07@gmail.com>

Oana Negrea <oana.elena.negrea@gmail.com>

Ion Daniel Popa <iondanielpopa@yahoo.com>

Diana Tihan <tihandiana@yahoo.com>